

## 从巴公房子到武汉关广场

当江汉关钟楼敲响终点与零点交叠的时刻，2025年的列车从长江大桥呼啸而来。

年末岁首，一个个“人文热点”温暖江城——巴公房子归来，武汉关广场开放，央视春晚分会场相中黄鹤楼，武汉入选长江文化发展标杆型城市……不由让人惊诧“武汉每天不一样”。

年前的12月5日，巴公房子变身“巴公邸”风貌酒店，主打“复古摩登风”，引来俊男靓女拍照打卡，圆堡下的廊檐拱券红墙，满是青春的容颜。

巴公房子1910年出自俄国茶商巴诺夫兄弟之手，曾经领衔武汉高端公寓楼的“最早”和“最大”。更不用说，中俄万里茶道无法忽略它的存在，2019年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在其间开设“万里茶道展览馆”再恰当不过。那些茶模、茶刀、天平秤穿越时空，讲述“东方茶港”的繁花往事，其实巴公房子和周边的顺丰茶栈、新泰洋行、李凡诺夫公馆，无不是活在街头的历史营造者。就在巴公房子开放后的第三天，7日在武汉召开“万里茶道遗产保护圆桌会议”绝不是巧合，中国、蒙古国、俄罗斯三国发布“武汉倡议”，看来美好的事情也时常扎堆。

如果以开放的视野越江跨洋，巴黎圣母院也在7日这天修复亮相，广场盛大的音乐会闪现华人艺术家朗朗、马友友的身影，环球同此凉热，人类珍视共同的文化遗产。

城市价值的一个重要源泉，来自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由此塑造个性与品质。巴公房子雄踞黎黄陂路、兰陵路、洞庭街、鄱阳街交汇处，涌动百年积淀，化为时尚地标，引领老街区一派浪漫风情。它那独特的三角形建筑造型，激起有心人搜索出上海武康大楼，它俩确实像一对孪生兄弟。而武康路沿线点缀有巴金、顾颉刚、王元化、张乐平等名人旧居，背景为整个“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圈入的优秀历史建筑达1074幢之多。

巴公房子辐射所及，同样不乏优秀历史建筑遗存。2020年11月17日《汉口历史风貌区实施性规划》发布，规划将巴公房子等百年老建筑打造成标杆性文化场所，以此为基础形成世界级人文时尚片区，如今已初展风姿。年前的12月29日，武汉关广场一期项目迎宾，覆盖上海路至天津路、串联南京路和青岛路，把江汉关、日清洋行、花旗银行、横滨正金银行等百年建筑拥入怀抱，似乎与巴公房子遥相呼应。

人文遗产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保留城市肌理，赋予现代功能，是对历史文化最好的尊重与传承。万里茶道通向“一带一路”共建，武汉关广场连接江滩景观带。我们可以借用巴黎市长德拉诺埃《为了巴黎的荣誉》一书中所言：“城市的终极意义就在于其延绵不断的历史。”

那么，本刊“阅城偶记”这一小小专栏，无非是踏响历史履痕，把它们唤回生活现场，传递人文温度，点亮城市之光。

（简桦）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罗联峰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子渝 刘玉堂 刘庆平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张笃勤 陆永初

陈芳国 姚伟钧 涂文学 彭小华

编委会主任：陈诗亮

副主任：朱向梅 刘洪波 熊少明

董菲 杨华 阮祥红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焕桥 王四清 朱永利 刘海燕

李文洲 李敏娟 张冰峰 张智勇

陈红英 林伟 唐云峰 谭艺琴

潘红莲

主编：阮祥红

副主编：朱伟峰 丁星火

执行主编：丁星火

特约编审：简桦

本期责任编辑：许濛

编辑：刘玮 章旷怡

封面设计：王鹏

## 阅城偶记

<<< <

1 从巴公房子到武汉关广场 / 简桦

## 时代年轮

<<< <

4 1985，中南商业大楼搅热商海 / 王钢

## 风雨同舟

<<< <

12 三重境界三重梅 / 程生达（口述） 章旷怡（整理）

## 九城同心

<<< <

16 咸宁温泉：一首流淌千年的赞歌 / 胡沙岸

## 委员天地

<<< <

22 在追光逐电中守护交通安全  
/ 杜志刚（口述） 章旷怡（整理）

26 缘聚江汉 共筑梦想 / 范宏彬

# 目录

## CONTENTS

### 商聚汉皋



- 29 追光 27 年：热爱，是最美的答案  
/ 潘小平（口述） 闻 夕（整理）

### 烽火江城



- 33 “保卫大武汉”：全面抗战的时代主旋律  
——“保卫大武汉”系列之一 / 涂文学
- 40 1938 年“美国秘闻”中的武汉抗战 / 孙君恒 王富林

### 人物述林



- 46 刘伯垂：武汉早期党组织的创建者 / 刘旺琳 田子渝
- 53 辛亥志士夏道南 / 张艳平

### 都市寻踪



- 57 武汉航空轨迹追寻（一） / 刘宝森

### 往事漫忆



- 61 湖乡古镇大集场 / 周 敏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大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每月 28 日

定 价：8 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82220669（传真）

E-mail: whzxwzsl@163.com

## 1985，中南商业大楼搅热商海

◇ 王 钢

轮印：1985年元旦，中南商业大楼在武昌中南路开业迎宾，成为武汉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百货商场，引领中南路蜕变为繁华商圈，刷新江城商业版图，跻身全国大型商场15强。李鹏总理、王任重副委员长等国家领导莅临视察，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等外国贵宾前来参观访问。



“中南商业大楼，引导消费潮流”。  
一句广告语，承载着多少武汉商业的骄傲。一座商场，带活一个商圈。一个商圈兴起，改变一座城市商业格局。

如今，为顺应时代发展和业态升级，中南商业大楼已更新为中商广场，但“购物去中南”依然是老武汉人的共同记忆，也积淀为武汉城市的历史记忆。

## 破局“北重南轻”

武汉历来是商业重镇，但受地理位置、商业环境等影响，大中型百货商场均集中在江北汉口一地，如武汉中心百货大楼、武汉商场、六渡桥百货公司等，形成“北重南轻”的武汉商业格局。每逢节假日，江南武昌的市民不得不乘车坐船涌向汉口逛街，带来极大不便。

为改变三镇大型商场不平衡的局面，满足市民的需求期望，市委、市政府在1972年提出在武昌兴建大型综合百货大楼，并在武珞路和中南路交汇的丁字路口规划勘查。

1980年2月，湖北省计委批复：“中南路百货大楼为综合性百货大楼，经营品种不少于3万种，总建筑面积控制在30000平方米以内”，强调设计既要美观大方实用，又要表现出现代化商业大楼的气派，20年后不落伍。

综合性百货大楼落户中南路9号，定名为中南商业大楼，建筑投资以贷款方式安排，1982年7月破土动工。

1984年，武汉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以“两通”（流通、交通）为突破口，敞开三镇大门，加快商业体制改革步伐。市委、市政府把握机遇，进一步提出把武汉打造成全国区域性经济中心，以门类齐全、规模宏大、辐射面广的商业和市场设施作为延伸触角。由此，武汉大中型商场的建设和改造蔚然兴起，商业重镇焕发活力，中南商业大楼于当年12月建成使用。

1983年出任汉阳商场副总

经理的麻建雄，对中南商业大楼建设的历史背景较为了解，他对笔者讲述：“20世纪80年代初是武汉市商业大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武汉百货业的这一轮发展主要体现在：一是旧百货商场的改造，二是新百货商场的建立。中南商业大楼就是新百货商场的建立这种形式。当时江南武昌按区划分，武昌区有武昌百货商场，洪山区有洪山百货商场，青山区有青山百货商场，市里就想在武昌建一个相当于武汉商场规模的大商场。中南商业大楼，就是在改革开放不久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一个大商业体，虽然它还不是现在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这样的商业新业态。中南商业大楼的主要干部和职工骨干，是从市商业局所属的武汉商场和中心百货大楼抽调的。”

## 崛起商业新地标

1985年元旦佳节，中南商业大楼隆重举行开业典礼，湖北省省长黄知真前来剪彩。大楼以高大宏伟的气势、典雅大方的风姿耸立于中南路，主楼8层高49米，建筑



1985年元旦，中南商业大楼开业人如潮涌

面积 3.52 万平方米，营业面积 1.6 万平方米，店堂宽敞，布局合理，设备精良，装饰华丽，通风、风幕、电梯、音响广播、自控灯光等先进设施一应俱全。

当年，麻建雄不仅参加了中南商业大楼建筑设计研讨会，更直接参与了店堂室内设计。他回忆道：“中南商业大楼的建筑模式，采用了我国北方即以北京为主的大型商场模式，店堂一楼内空很高，没有像现在这种压低的吊顶或中庭模式，显得很气派。在店堂陈设上，也有三大创新：第一是铝合金材质的柜台货架，取代了传统的木制柜台货架。木制柜台窄小，铝合金柜台面板更宽，显得十分大气，也体现出北派商场建筑设计的特色。第二是立体的灯光布局，取代了单一的灯光照明。在灯光的综合运用上，首先把日光灯管隐藏在玻璃柜台和货架内转角处，把商品照得琳琅满目；其次是打破以往根据柜台走向在上空平行摆放日光灯的方式，而是将日光灯连成一个个扇形宫灯样式高空垂吊，与下方柜台货架内的灯光交相辉映，相比传统灯光照明是一大进步。第三是柜台之间的通道加宽方便顾客，并使中道区与周边柜台相互呼应，更好地优化了购物环境。”

中南商业大楼作为武汉最新式的大型百货商场，共设百货、五金、家电等 11 个商品部，并有旅社、娱乐厅等附属业务。一、二层各为 4000 平方米的零售大厅，并在一层专设全市最大的食品自选市场。三层是“店中店”形式，设有家具、家用电器、自行车、缝纫机、工艺、瓷器等 20 多个专业店，



1986 年，中南商业大楼店堂一角

专供零售、批发、联营、洽谈生意和大件商品自选使用。四层为娱乐服务部，开放舞厅、游艺厅、音乐茶座、儿童乐园、快餐厅等，吃喝玩乐应有尽有。五、六层开设旅社服务部，为外地来汉顾客提供食宿。

中南商业大楼开业盛况空前，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据《长江日报》报道：“武昌中南路口一幢营业面积比原武汉商场大一倍的新型商业大楼昨日敞门纳客。这是一座顾客既能买东西，又有地方玩，有吃又有住的综合性的商业服务大楼……目前，像中南商业大楼这样大规模的管吃、管喝、管玩、管住的综合性商业服务大楼在全国还不多见。昨日开业，中南商业大楼向顾客提供了 2 万多个品种的商品，大楼外还另设了电冰箱、电视机、皮靴、毛毯、洗衣机等供应点。数万顾客从青山、汉阳、汉口涌向这里，中南路一带人山人海。”“中南商业大楼元旦开业投放的电视机、收录机、洗衣机、电冰箱、台扇等家电商品二千多台，顾客通宵排队购买”，潮水般的人流甚至挤倒了十几节柜台，当日接待顾客近 30 万人次，销售额

高达 98.9 万元，创下武汉零售商场单日销售之冠。

中南商业大楼的建成开放，列入 1985 年市政府工作报告，它与武汉商场、中心百货大楼、汉阳商场等形成共同发展的局面，为欣欣向荣的武汉商业涂抹一层绚丽底色。

### 全国招标总经理

中南商业大楼开业火爆，但热闹并未持续太久，缘于中南路是一个刚开垦的商业处女地，经营不够理想。建大楼先后贷款 2000 万，一年利息 100 万。按还款合同规定，开业头两年应还款 600 万，可到 1986 年底只还款 427 万。开业第一年，营业额仅 7650 万元，创利 265 万元，一时议论声四起。

“政府把几千万元投资往水里丢，把个大商场建在不是做生意的地方”——有人叹息。

“生意人靠人盘嘛！武昌人口近百万，还怕生意不兴隆？”——有人不服气。

时代大潮把中南商业大楼推向改革的前台。1986 年 11 月，市商委根据市委、市政府要求，确定在中南商业大楼进行资产经

营责任制改革试点，并面向全国招标总经理，谁有本事夺标准当。市商委聘请专家核定标底：3 年实现利润 1997.5 万元。

一石激起千层浪。教师、干部、营业员、大学生，武汉人、重庆人……报名投标者达 49 人之多。经过资格审查、标书评审、笔试、公开答辩、民意测验、综合素质考核等 6 道环节角逐，年仅 37 岁的中南商业大楼原副经理严规方，以“六个第一”的优异成绩脱颖而出，以 3 年实现 2200 万元利润标的一举中标，出任中南商业大楼总经理。面对这份沉甸甸的责任，严规方直言：“2200 万元，曾经是我事业的寄托、生命的希望。1986 年 12 月 31 日，我在合同书上签字的一刹那，我的一切就与这 2200 万元紧紧绑在了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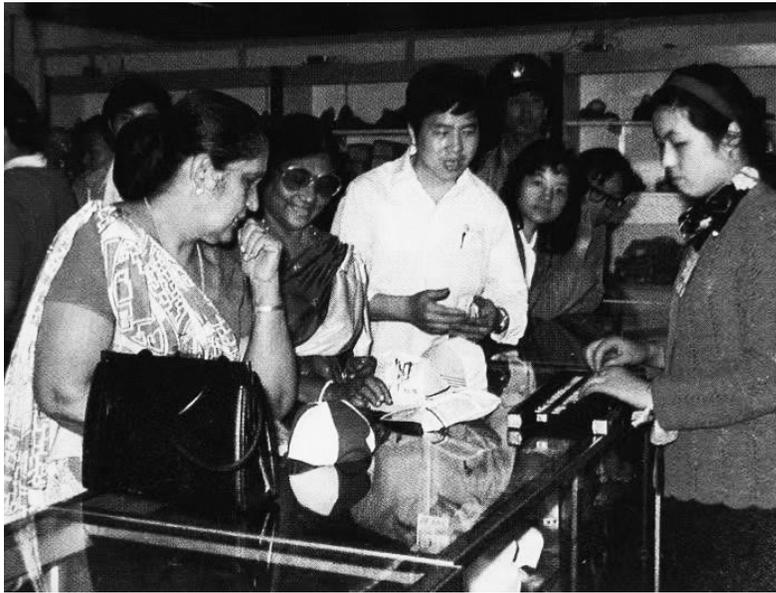
### 首推资产经营责任制

大浪淘沙，机遇与挑战并存。1987 年 1 月，中南商业大楼作为全国大型商业企业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的首家试点单位，建立以资产增值为主要目标的经营管理机制，一开国企改革之先河。

严规方因势利导，大刀阔斧改革企业内部机制。其一，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层层招标承包和全员劳动优化组合，对干部一律实行聘用制，实现“能者上，庸者下”的动态管理机制；对职工实行岗位劳动优化组合，每个人都自主竞争岗位，每个人又都被岗位选择。其二，完善激励机制。营业一线实行“百元销售工资含量计酬”，以绩论酬，拉开分配层次落差，调动了积极性。扩大销售，热情服务，不再是“交



中南商业大楼总经理严规方



1986年5月28日，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访问中南商业大楼

“差式”的不情愿作为。其三，健全约束机制。明确经营范围，在经营方向上自我约束；开设“内部银行”，在资金管理上自我约束；实行“比价退差”，在物价管理上自我约束；严格财经纪律，在费用开支上自我约束。

中南商业大楼将经济指标通过招标，分解到各商场、柜组，形成了金字塔式层层包、层层保的格局。从总经理到营业员，全员实行竞争上岗、优胜劣汰。18个商场的经理、科室负责人，通过招标产生。118名干部职工投标（其中干部61名，职工57名），中标聘用72名，10多名职工中标当上经理、副经理。实现全方位劳动自由组合，上岗人员签订《岗位劳动合同书》，组合掉的职工撤岗。1361名一线营业人员，57人被撤岗。

改革激发了职工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变过去的“要

我干”为“我要干”。“百元销售工资含量计酬”与岗位竞争配套，使“不干事的无工资，不在岗的没奖金”成为人人遵守的法则，真正体现了多劳多得和按劳分配。

### 提前8个月实现3年目标

中南商业大楼讲求经营之道，在商战中敢闯敢拼。首先，巩固老关系，发展新朋友，拓宽进货渠道。1988年，与全国3100多家工商企业建立供货关系，对重点货源采取参股、基地投资等形式，择优选定430家常年骨干商品供货基地，并在上海、天津、深圳等地设置办事处。其次，经营求新，品种求全，价格求廉。大楼在组织彩电、冰箱、黄金、自行车等名优骨干商品的同时，积极采购群众日常必需用品，做到高档大件商品不断档、

日常必需用品，做到高档大件商品不断档、

## 改革中崛起的武汉商业巨子

### ——中南商业大楼提前八个月实现三年承包目标的回顾与思考

#### 站在两千两百万的台阶上

2000万，这个数字在武汉商业界，曾引起过一阵不小的轰动。1988年12月31日，中南商业大楼提前八个月实现三年承包目标，创造了武汉商业史上一个奇迹。回顾这一历程，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力量，使这座在武汉商业界崛起的新巨人，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企业，成长为一个拥有2000万资产的商业巨子？

中南商业大楼是武汉市最早实行承包经营的企业之一。1985年，在武汉市商业局的支持下，大楼成立了承包经营委员会，由马蔚华任主任。马蔚华在承包经营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说：“我们承包经营委员会的成立，是武汉市商业改革的一个突破。我们要通过承包经营，把企业的命运同职工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使职工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

#### 支持经理到位过“三关”

马蔚华说，承包经营委员会成立后，我们首先解决的是经理到位的问题。马蔚华说，承包经营委员会成立后，我们首先解决的是经理到位的问题。马蔚华说，承包经营委员会成立后，我们首先解决的是经理到位的问题。

#### 凭借会员岗位竞争起飞

马蔚华说，承包经营委员会成立后，我们首先解决的是经理到位的问题。马蔚华说，承包经营委员会成立后，我们首先解决的是经理到位的问题。马蔚华说，承包经营委员会成立后，我们首先解决的是经理到位的问题。

#### 改革唤醒了职工民主意识

马蔚华说，承包经营委员会成立后，我们首先解决的是经理到位的问题。马蔚华说，承包经营委员会成立后，我们首先解决的是经理到位的问题。马蔚华说，承包经营委员会成立后，我们首先解决的是经理到位的问题。

1989年4月24日，《长江日报》整版报道中南商业大楼

小商品经营齐全，商品种类由1万多种增至3万余种，以“品种全，价格廉”来招徕顾客。同时，采用展销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现场表演展示会、信誉卡购货、让利销售等多种方式，以灵活多变的手段扩大销售。

同时，在服务上创信誉，公开宣布“比价退差，七试一退”。凡出售的电视机、电冰箱、收录机等高档商品试用7天，200元以下小商品则实行包调、包换、包退。凡出售的商品高于市属同类国营商店的价格，均可“退还差价”，确保了顾客购物“安全感”。

1988年，中南商业大楼被武汉人评选为“售后服务最周到的商场”“店堂设施最好的商场”“经常组织消费者满意商品的商场”，荣登武汉20家知名度最高的企业榜单。

试行资产经营责任制3年，提前8个多月完成承包目标——销售额4.65亿元、利润2200万元，迅速从武汉商界崛起，全国同行为之瞩目。

开业5年，实现销售额8亿余元、利润3604万余元，不仅还清全部建设贷款，还兼并一些企业壮大了实力。

武昌的商业地标从司门口易主，中南路成了武昌人购物的首选之地。

### 8岁新店合并百年老厂

1990年，中南商业大楼作为武汉市首批股份制试点企业进行改革，成立中南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中国资



1993年9月，武汉市长赵宝江（右）在中南商业大楼检查工作

本市场翻开新的一页，武汉商业股份制改革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92年，中南商业大楼再次发行股票。1993年，年销售超10亿元的中南商业大楼位列全国大型商场15强。1997年，“武汉中商”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中南商业大楼走上兼并扩张之路，实行区域多业态、专业化连锁经营。1993年合并负债3000万元的老格子汉口蛋厂，改建成现代大型商场中南商都。“8年的中商合并了百年的蛋厂”，成为武汉国有资产优化的范例。1995年，中南商都实现销售收入2.2亿元，又成一支新生劲旅。

武汉市长赵宝江称赞：“中商集团利用自己的市场、资金、信誉、机制优势，主动同国有亏损企业合并，并通过启动亏损企业内在发展优势，寻求和实现自身的扩张与发展。这是企业发展的一条新路。”

此外，当江城零售巨头在本土市场拼命厮杀之际，中商集团把经济触角伸向市外、省外。1996年开办沙市连锁店，首家“跨



1990年7月20日，商业部部长胡平视察中南商业大楼，欣然题词“科学经营人为本，服务至上万客来”

市”拓展；接着把分店开到河南信阳和湖南岳阳，首家“跨省”经营。

### 激活“两大商圈”

一座商场，首先带活了一条商业街。

中南路1957年始建，1981年扩建，长1.5公里，沿街单位几乎为政府机关和科研机构，虽是武汉市整体规划中新开辟的闹市中心，但仍然偏居一隅较为冷落。

中南商业大楼迅速崛起，带来更多的人流、客流和消费流，巨大的商机使酒店、餐馆、专卖店、娱乐场所等随之兴起，热闹的中南路取代解放路，成了武昌市民购物休闲的好去处，

1990年已是一条颇具规模的商业街，成为武昌地区最繁华的商业旺地。

1997年，中商广场购物中心以180米的身姿拔地而起，与中南商业大楼形成“双子星座”。中商广场45层，其中9层裙楼与中南商业大楼连为一体，营业面积达3.5万平方米，经营品种超10万种，除了特色百货外，更集休闲、娱乐、健身、餐饮等多种综合服务功能于一体，打造高端品质购物体验，塑造“江南第一品牌店”商业形象。

中商“双子星座”闪耀江南，天紫广场、银泰百货及大型超市、专业卖场等跟进入驻，各大金融机构也纷至沓来，商业类型日益丰富，中南商圈更加繁华。

2001年，为顺应现代百货特色化、主题化的趋势，中南商业大楼斥资近亿元升级



中南路“双子星座”夜景

改造，由一个“大而全”的传统百货店，转型为突出服装、针棉、化妆、珠宝、黄金等特色的现代百货店，一举坐上仅次于武商集团的武汉商界第二把交椅。

同在 1997 年，中商集团开辟徐东平价广场，首创“超市+百货+家电”的多业态组合营销模式，成为武汉市仓储商场的领头羊。麦德龙、欧亚达、国美等大型超市和专业市场接踵而来，徐东商圈初现雏形。

2005 年，建成 20 万平方米的华中地区最大购物休闲中心——武汉销品茂，人称华中“商业航母”，又将徐东商圈推向高峰。

两个商圈，中南商业大楼功不可没，堪称改革开放后武昌商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2008 年，中商集团已拥有百货店 9 家、连锁超市 31 家，发展壮大为一个“商贸多业态，经营连锁化，管理现代化”的大型商业集团，连续多年销售、利润位居全国商业 10 强之列。

### 蝶变中商广场

2012 年，借地铁 2 号线建设之机，中商集团对中南商业大楼和中商广场购物中心进行提档升级。2013 年，中南商业大楼与中商广场购物中心合二为一，打通空间布局，实现购物体验的无缝连接，商场体量由此扩大一倍，蝶变为中商百货中商广场。

中商广场经营面积达 8 万平方米，按照国际化现代百货店标准建设，以化妆、钟表、男女服饰品牌为突破，定位中高档精品百货店，引进更多国际品牌，让消费者与巴黎、纽约等国际时尚中心“零时差”，呈现一派大型时尚之都的全新形象。

商流如潮，带动中南路蝶变为武昌最核心、最繁华的商圈，世界 500 强分支机构、



中商广场购物中心

国内 500 强的总部或区域总部纷纷入驻，星荟城、天紫广场、外文书店、苏宁易购、工贸家电等星罗棋布，使这条商业金融街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大道。

40 年春华秋实，秉持“社会造就中商，中商服务社会”的企业理念，从中南商业大楼到中商广场，从筚路蓝缕的拓荒者跃身为挺立潮头的商业巨擘，不仅铸就了武汉商界一块传奇耀眼的“金字招牌”，更见证了武汉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

王钢，武汉图书馆文献部副主任，武汉地方志专家库成员

## 三重境界三重梅

◇ 程生达（口述） 章旷怡（整理）

**人物名片：**程生达，民盟中央美术院武汉分院名誉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研究员，湖北省美术家协会理事，武汉美术家协会原副主席、艺术顾问，市政协第七、八、九届委员，国家一级美术师。

南宋诗人蒋捷在其诗作《虞美人·听雨》中曾咏叹到：“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

诗人从少年、壮年到老年有着不同的悲欢离合，在雨声中听到的东西自然也不尽相同，这种情感变迁的感悟实乃古今相通。

我幼时即画梅花，在数十年的艺术生涯中已有三次转型。每次转变不仅是绘画创作技法的成熟，也蕴含着不同人生阶段的情感体验，可谓三重境界三重梅。

### 少年画梅乡野间

1941年，我出生于汉南乌金农场余家墩。我从小就喜爱画画，小时候在田野间放牛时，望着起伏的山脉和翠绿的稻田，常拿着铅笔在作业本上涂涂画画，勾勒出眼中的景象。成名后，有许多人问是谁最早教我学绘画的，其实没人教我，是大自然给了我艺术的启蒙，是山野间一草一木激发了我的创作天赋。

我6岁时母亲去世，11岁时父亲也病逝，年幼孤苦无依，只能寄居在汉口伯父家求学。从小学到初中，粗茶淡饭，学习总是名列前茅。1959年，初中毕业后我考入湖北艺术学院（现湖北美术学院）学习美术，第一次接受正规的美术专业训练。那个时候



《白雪世间香》

整个学院加起来只有不到 200 人，我的学习成绩总是排在很前面。

不幸的是身体一直都不太好，在冬天寒潮来临时穿的还很单薄，结果染上了肺结核被迫休学，一直住在大嘴乡姐姐家养病。大嘴乡的这两年，虽然迫于经济压力复学无望，但我的专业没有丢下，一直在坚持画画，画遍了那里的堤岸绿荫和田园风光。

后来为了生计，我拉过板车、打过短工、画过人像。1963 年初冬，一家服务单位把我招了过去，在办公室做抄写工作，因为会写会画，时常被别的单位借出画广告、写会标。1972 年，我调到江岸区商业副食品公司当美工，做橱窗设计。

那时候还没有电脑，所有的设计只能靠勤动脑和勤动手。我和同事周永基两个人配合，他写招牌我画画，把汉口车站路一条街搞得特别漂亮，现在好多老照片里面的

老汉口商铺招牌都是我们当初的设计。就这样，我在商业局搞了 10 年工艺美术。

工艺美术自有它的价值和美感，但我内心更钟情于描绘自然界中的景物，如牡丹、墨竹、百合、紫藤等山花野卉，特别是梅花。湖北自古就是梅花的故乡，年幼时常遇野生梅散见于田野之间。武汉的梅园规模和研究都在全国名列前茅，十大赏梅点闻名遐迩，始建于 1956 年的东湖梅园为全国四大梅园之一，是著名的赏梅胜地。

工作之余，我常去梅园写生，徜徉于梅林之中寻诗觅画，近距离观摩梅花的形态。这一阶段我画的梅花很是“热闹”：枝干劲挺，花繁气盛，富于青春活力，但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

### 画出梅花的精魄

凭着自学的技艺和一腔孤勇，1977 年，我带着梅花处女作《红梅颂》参加了全市美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高立洁玉图》

展，没想到获得广泛好评，引起社会关注。自此后，我作为一个“非专业”的画家正式跻身画坛，创作热情也日益高涨，选定了创作的主攻方向——以画梅为主的国画花卉。

那时我的梅花渐渐打响，在画坛也小有名气。某次市群众艺术馆举办书画笔会，我受邀参加。正埋头创作一副花鸟画时，馆长来到我的身旁，观看片刻后问我叫什么，是哪个单位的？在得知我在商业部门工作后，他建议我转到群艺馆来。在此之后又颇费了一番周折，终于在1982年8月，我正式调到群艺馆书画部工作，开始专职创作书画，这一年我已41岁。

在群艺馆的工作非常繁忙，武汉市13个区县的文化馆都是我的工作范围，不时要下去讲课、培训，每年还要抓大展。同时群艺馆也有其特殊性，它是为群众提供文化服

务的公共场所，是一个门朝群众开放的文化部门。因此每天馆门一开，找我的人络绎不绝，我都一一接待，和爱画的各界群众一起交流探讨。

和群众接触多了，我的绘画风格也有了改变。第二阶段画作更加成熟，把西画素描等技巧借鉴到画梅中来，在技法上比之前更加熟练。之前画梅注重于原生态的梅花形态，贴近现实中的梅花，比较真实；后来则更注重画出梅花的精魄，既来源于真实，又高于真实。

喜欢画梅花，是因为崇尚梅的精神品格。我将理解梅花的精神气质作为创作立意的出发点，根据前人的经验和个人的体会，提出梅花的精神气质是骨气、生气、清气的“三气”说。骨气缘于梅干之铁骨铮铮，更在于冒雪冲寒、萌花报春的精神。为此我



《朗月》

往往以燥笔干墨塑老干如铸铁、如顽石的质感，如苍龙盘屈的折转之力，以雪梅现其铁骨冰魂的气质。

美的创造是源于心灵的感悟，追求美的东西，使之在作品中得到完美的表现，这是画家的责任。曾有一香港客商愿以高价买下我的《百梅图》，被我一口回绝。但在东城垵农场职工文化宫落成之际，我欣然命笔，画出《红梅牡丹》《月是故乡明》两幅作品并赠送给他们。前些年，我将凝聚心血的近百幅画作，全部捐给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程生达

### 面向群众的艺术

在任职武汉群艺馆美术部主任、市美协副主席、市政协委员期间，我一直在努力用好的文艺作品引导群众，坚持把文艺的方向带对。用艺术服务大众，建树文明，陶冶身心，净化环境。

我始终认为，美术作品要走出陈列馆、展览厅，到民间去，要让老百姓能接受、看得懂，使艺术真正为人民群众服务。艺术是艺术家与受众之间的心际交流，雅俗共赏是艺术的一种境界。对于绘画的一些专业性要素，老百姓可能不太懂，但老百姓懂得什么是“美”，艺术本身就是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我画画追求的一直都是清新、朝气、鲜活、秀逸，让人看得懂，得到美的愉悦。

在近半个世纪的艺术生涯中，我一直追寻着中国画的当代性对审美意识和价值观的影响，把当代人对审美要求的信息空间，作为语言组合的重要因素。退休之后，我也并没有放弃对创作的思考，到大自然中去索取，在传统基础上创新——这就是我的路。

我家的阳台就是一个花园，琳琅满目

的几十种花卉绿植，有买来的，有花友送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我去各地写生时，在农村山上挖回来的。我种的花草，在品种的选择上有讲究，都是寻常人家少有的品种。虽然大多数是草本植物，但是不怕冻，有的还是冬季开花，花期较长，阳台上四季都是红花绿叶笼罩，十分赏心悦目。

因为兴趣养了花，能够感受到植物带给人的精气神，与此同时，养花也是给画画寻找灵感。把大自然的植物搬回了家，看到阳台上的植株丛生，就像在山区走路一样，有一种回归感，我喜欢这种原生态。

最后一个阶段的梅花，我重点体现它的“老”“干”，表现梅花的骨感。笔下画作多老干盘屈，结节暴突，枝干纠结多姿，着花层叠茂密。很难相信，千年的梅花在中国还有在开的，那横空恣纵的老干，斑驳槎枒的皴裂，记载着悠悠岁月，沧桑历史，引人遐想，耐人品味。

## 咸宁温泉：一首流淌千年的赞歌

### ◇ 胡沙岸

咸宁是中国温泉之乡。境内温泉资源丰富，6个县市区，县县有温泉，计有大小泉眼1.8万处，地热水年总储量达700万吨，平均日出水量1.5万吨。依泉而建、因泉而



启功先生题写的“华中第一泉”牌楼

名的温泉镇，是咸宁市核心城区，也是咸宁市委、市政府所在地。

咸宁温泉历史悠久，其开发、利用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相传宋仁宗赵祯南巡时，曾来咸宁沐浴，并御赐“温泉沸波”四字，如今被列为“咸宁八景”之一。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所载“沸潭”，位于温泉镇潜山下的淦水河月亮湾河段，现有大小泉眼10多处。不远处，就是架在淦水上的温泉一号桥。桥头一边，一座牌楼高高耸立，由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题写的“华中第一泉”五个金色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 “沸涌如汤”——文人笔下的咸宁温泉

温泉之城，古韵悠悠、文脉绵延。从古至今，不少古籍记载咸宁温泉，不少文人墨客吟咏咸宁温泉。



20世纪90年代的初级开发

南宋地理学家王象之，游历四方，前后耗费三十年时间，于宝庆年间著成地理学名著《舆地纪胜》。他在书中详细记载了咸宁温泉的具体地址，“沸潭在咸宁县潜山侧，水出石窠间，沸涌如汤”。这是迄今为止，有关咸宁温泉最早的文字记录。

明代咸宁籍名士孟养浩，是孟子六十一世裔孙，曾任南京提督，户部侍郎等职。其主持编修的《咸宁县志》中，记载咸宁“八景”，温泉名列其中，称为“温泉虹影”。孟养浩幼弟孟养蒙的孙子、咸宁县学庠生孟佐盛，一次列举了咸宁地区几处有名的温泉，即蒲圻（蕲川）五洪山、崇阳桃溪东及咸宁潜山，对咸宁潜山温泉的出处、水温、功能、气味和景象也作了一番描述，考证到：“间考温泉之出，本于丹砂者十之一，本于白矾者十之三，其余皆硫磺也。”

康熙年间，咸宁知县何廷韬《潜谷温池》诗云：“云护潜岩别有天，到来仙谷火为泉。气蒸五色赤龙伏，水洩一泓黄石愆。孺子濯缨和自洽，冰人解冻暖依然。稚川辟谷丹成后，温彻寒潭奉新篇。”

时间来到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文化名人下放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当时的他们，大多是五六十岁以上的年纪，却要长年累月进行农事劳作，其中艰辛，不难想像。

能在难得的方便之际，到温泉洗个澡，是梦寐以求的美事。

著名学者顾学颀在《向阳湖点滴》回忆文章中写到，干校后期，“有机会进城，和一位同事到温泉洗澡”，他赞美咸宁说：“山清水秀，到处茂林修竹，桂花飘香，汨汨的温泉，洗涤净红尘的尘垢，等等，都是北国的乡土所少有的。”

诗人牛汉，1969年9月下放到向阳湖干校十四连劳动改造，时间长达五年多。因为力气大，他是连队的头号劳动力，经常拉装载千斤以上的板车、扛二百余斤的麻袋。有一段时间，他还专职杀猪，一个人提猪，完成宰杀全流程。

长期超负荷的劳作，也造成他腰肌严重劳损，晚上睡觉翻身都困难。加上内心苦闷，诗人疲累至极，常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于是，在寒冷的冬天，他翻过几座山，奔向温泉，让“热乎乎的流水”，使“心胸得到一点温暖”和片刻缓解。他在《温泉》一诗中描写道：

几十股 / 突突的温泉 / 吐着热气和泡沫 / 向上涌翻 / 一阵阵暖流 / 从疼痛的背脊 / 一直热到前胸……

“文革”结束后，牛汉将写于干校的部分诗歌汇成诗集《温泉》出版，并荣获全国优秀新诗奖。诗集的名称，就是取自咸宁的温泉，可见温泉在诗人心中的份量。

上世纪90年代初，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为咸宁温泉题词“华中第一泉”。这是对咸宁温泉的高度概括和高度赞誉。咸宁市专门在淦水河温泉一号桥头，修建“华中第一泉”迎宾牌楼。这座仿古牌楼，三间四柱，三楼分层，以花岗石为基座，绿色琉璃瓦斜坡顶，高约15米，“华中第一泉”五个金色大字，引人注目。



大雪笼盖，冬季泡温泉 李专摄

同是 90 年代，诗人舒婷来温泉采风后，赞美说：“这里的温泉，是兑进了桂花清香的温泉，是筛滤过竹风茶雨的温泉，是夹杂了楚风吴韵的温泉。”作家刘醒龙撰文赞叹道：“拥有温泉的小城这时无法回避地成了我心中城市的楷模……”

从古到今，对咸宁温泉的记载还有很多，从文字中可以看出，这些都是人们对温泉亲身体验之后的感触，也是温泉利用的原初记录。

### 声名未彰——近代以来的开发利用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将温泉分为热泉、冷泉、甘泉、酸泉和苦泉。他是我国最早的温泉分类学者之一，阐述了温泉治疗方法与适应症，并指出温泉治疗应结合自然环境、药物治疗和营养，才能获得最佳效果。

经科学鉴定，咸宁温泉系硫酸钙弱放射性氡泉，水温一般在 49—51.5 摄氏度，最高可达 54 摄氏度，最低 35 摄氏度；水中含有硫酸盐、碳酸盐、钙、镁、钾、钠等十多种矿物质，对慢性颈肩腰腿痛、关节炎、

神经炎、风湿病及多种皮肤病有明显疗效。局限于多种原因，古人对温泉的利用还停留在泡澡的层次。咸宁温泉真正延用到医疗上，有针对性开采利用，始于近代的抗日战争期间。

1938 年 10 月，日本侵略者占领咸宁后，便将温泉资源最集中的月亮湾河段划为禁区，修建“军人病院”，利用温泉为日军伤员疗伤，并作为官兵疗养之地。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此建有别墅。多年前这里还发现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整其旅，昭和十九年（1944 年）春，石琦部队”，是侵略者留下的铁证。

抗战胜利后，1947 年，国民党军队在日本侵略者医院原址，设立补充兵训练总队，作为新兵训练营地。1949 年 5 月咸宁解放，温泉被人民解放军接管。随后，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后方医院奉命进驻咸宁温泉，作为后方医院，收治一路向南的解放军伤员。

新中国成立后，医院经过几次更名，1958 年 2 月，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五医院。一九五医院引入温泉水，开设有专门用于治疗关节炎、风湿症、皮肤病等多种疾病的温泉病房。除此外，咸宁军分区、咸宁地委行署对外接待的潜山宾馆也设有温泉浴池。

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潜山周边一号桥和二号桥附近，多家小招待所相继开设温泉浴池，对民众开放营业。这一时期，咸宁主城区的温泉资源开发利用主要以国营公立单位疗养为主，兼有少量商业旅游服务项目，规模不大、声名未彰。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温泉开发

进入商业化阶段，平民温泉发展成为温泉开发利用的主线。1997年，武汉大型企业汉商集团来咸宁考察，之后建成汉商温泉山庄。这是汉商集团立足旅游产业投资开发，以“温泉养生”为主题建造的一座集旅游度假、商务休闲于一体的度假村。

2000年，武汉长印股份有限公司来咸宁投资兴建长印温泉酒店，这是咸宁第一家星级温泉酒店，客房和温泉健身理疗中心所有热水皆是淦水之下涌出的温泉水。酒店开张后生意火爆，和同处一号桥附近的汉商温泉山庄，堪称一时“双璧”，是许多咸宁人津津乐道的回忆。

这一时期咸宁温泉的开发还处于分散阶段，总体规模不大，地热资源浪费较为严重，且开发档次不高，配套设施不全，大都停留在“澡堂子”的水平。由于缺乏市场意识，经历短暂的辉煌后，咸宁温泉逐步陷入沉寂，亟待重塑形象，擦亮品牌再出发。

### 华美蝶变——连续盛会叫响温泉之都

1998年12月，咸宁地区撤地建市，城市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04年，咸宁正式纳入武汉城市圈建设，搭上长江中游城市群、中部崛起及“两型”社会建设发展的顺风车。为重新打造温泉品牌，咸宁市将淦水沿河两岸杂乱建筑拆除，以温泉桥为中心，沿淦河相继建起10余家高档的温泉度假酒店。

2006年6月，咸宁市被中国矿业联合会命名为“中国温泉之乡”。

2008年6月，在建设鄂南经济强市座谈会上，咸宁市委、市政府提出，要突破性发展以温泉旅游为主的旅游产业。不久咸宁市召开旅游发展大会，提出全力打造三大旅游精品，突破性发展旅游业，温泉休闲度假是其中之一。

2009年11月6日，由国家旅游局和湖北省政府联合举办的中国·咸宁首届国际温泉文化旅游节盛大启幕，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宗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热地、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为旅游节揭幕，省长李鸿忠致开幕词，国家旅游局副局长祝善忠致贺词。

本届旅游节为期4天，邀请了有关国家领导人、外国政要及20多个国家驻华使节、国内外旅游专家、学者及业界代表等近万人参加。期间举办开幕式暨国际友谊小姐世界大会全球总决赛颁奖晚会、“中国温泉之乡”授牌揭牌仪式、鄂南民俗风情歌舞《梦寻咸宁》演出等活动，影响巨大。特别是“万人同沐温泉”活动，10120名市民、游客参与，创造了同时沐浴温泉人数最多的“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纪录”。

2010年10月16日，中国·咸宁第二届国际温泉文化旅游节举行。节会之前，咸宁市在武汉、长沙、广州、上海举办新闻发



2009年，首届国际温泉文化旅游节花车巡游启动仪式

布会，开展温泉旅游宣传促销活动。盛会期间，举办了2010年亚洲沙滩排球巡回赛，温泉河大型主题灯会及多场经贸招商活动。其中淦河主题灯会共设43个大型灯组，展示区域长达6千米，规模宏大，万人空巷观灯，创下了水上景观灯组累计长度之最“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纪录”。

2011年10月28日，中国·咸宁第三届国际温泉文化旅游节举行。这一年，国土资源部正式发文命名咸宁市为“中国温泉之城”，咸宁温泉成为“灵秀湖北”十大旅游名片之一。

《湖北省温泉旅游服务质量规范》《咸宁沐浴温泉水质标准》等温泉相关地方标准荣获首届“荆楚十大好标准”称号，同时咸宁还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全国旅游标准化试点城市。

此后一直到2019年，一年一届，咸宁市连续举办十一届国际温泉文化旅游节。

从第一届开始，每届节会，咸宁市都盛情邀请世界500强、国内500强、上市公司、著名品牌企业高层、商会代表出席。第一届签约项目40个，合同金额184.45亿元；第二届签约项目39个，合同金额252亿元；第三届签约项目33个，合同金额259.81亿元；第四届签约项目50个，合同金额333.79亿元；第六届签约项目62个，合同金额548.8亿元……

每届盛会，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湖北日报等数十家媒体集中报道活动盛况，极大提升了咸宁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加快了咸宁旅游全域化推进速度，全市旅游收入快速增长。

2010年，咸宁市接待游客1157.08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59.41亿元，占全市



淦河夜景 邓东峰摄

当年GDP总量的11.4%；到2018年，全市接待国内外游客67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340亿元，旅游发展位次进入全省第一方阵，在武汉城市圈仅次于武汉市，位居第二名。2019年接待游客760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390亿元，占全年地区生产总值的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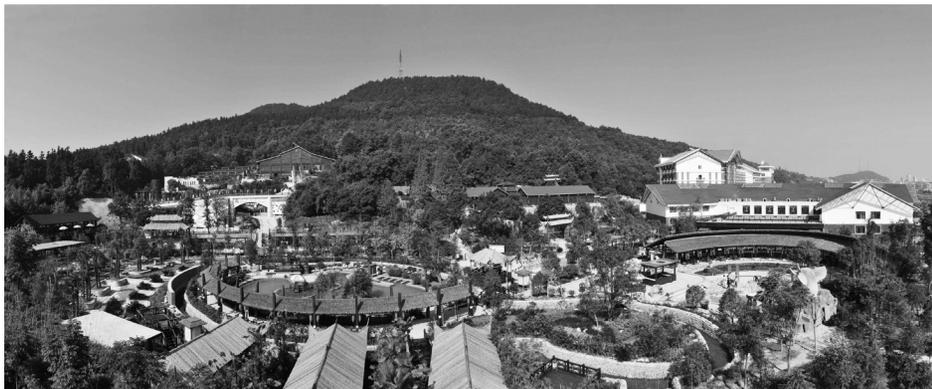
从第一届到第十一届，流淌了千年的温泉，终于在咸宁绿色崛起的春潮中喷薄而出，实现华美蝶变。碧桂园温泉、温泉谷、三江温泉、太乙、楚天瑶池等一大批星级温泉主题酒店，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兴建，旅游配套设施日益完善，咸宁城市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其间，2016年咸宁市通过首部地方立法——《咸宁市地热资源保护条例》。这是咸宁为保护温泉品质划出的一条监管红线，明确实行日限量开采制度；这是咸宁温泉开发利用的纲领性文件，具有标志性意义。

### 涅槃腾飞——美丽中国“咸宁样板”

面对近年来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及经济下行压力，咸宁市委、市政府把旅游作为

战略产业、新兴产业和强市富民产业来抓,积极推动“武咸同城”,找准在武汉都市圈功能定位,优势互补,借势发展。抓住生态这个基础优势,打造美丽中国“咸宁样板”。



背倚潜山的三江森林温泉

在中心城区,通过对温泉景区提档升级,打造环潜山温泉旅游度假区,进一步擦亮咸宁“中国温泉之城”金字招牌。碧桂园温泉、三江温泉、楚天瑶池温泉等,沿潜山脚下的淦水河道铺开,构成一条逶迤的温泉风景带。特别是三江森林温泉度假区等,楠竹成林,桂树飘香,各种原生态资源在这里集合,独具特色,引人入胜。

在鄂南大地,赤壁龙佑温泉、嘉鱼山湖温泉、崇阳浪口温泉……咸宁县县有温泉,处处涌沸波,游客去哪都能邂逅属于咸宁的温暖和热度。近年,通山县九宫山、咸安区梓山湖相继成功钻探多处优质温泉,进一步印证了咸宁地热资源丰富,潜力巨大。

春可临泉赏花,夏可戏水消暑,秋可沐浴养生,冬可泡汤观雪……四季轮回,咸宁温泉带来的快乐不变,体验越来越丰富。

据统计,2024年1—10月,全市温泉景区接待游客70.32万人次,较2023年同期增长15%;总营业收入6129.93万元,较2023年同期增长18%。全市温泉旅游产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2024年11月20日,在省文化和旅游厅支持下,“知音湖北·2024温泉嘉年华”暨第十二届湖北·咸宁温泉文化旅游节举行启动仪式。省政协副主席尔肯江·吐拉洪

宣布活动启动,联合国旅游组织大使祝善忠、世界温泉及气候养生联合会副主席查尔斯·戴维森与会。来自韩国、丹麦、中国香港和国内重点旅行社及温泉景区代表240余人参加活动。

经历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时隔4年之后品牌节会重启。通过节庆搭台、经济唱戏,把各类经济要素聚集到咸宁,以节促建、以节促变,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活动期间,同时举办长江流域民间文化艺术交流展示活动、2024年中国门球公开赛暨少数民族门球赛、千名大学生文旅推介人体验咸宁温泉等十余项活动。

“华中康养地,中国桂花城。”咸宁温泉的开发史,也是一部咸宁城市的发展史,一部咸宁人民的奋斗史。如何进一步利用优越的自然禀赋,加强温泉行业整体规划,引进战略投资者对温泉企业进行整合开发与转型升级,是咸宁今后一段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

(本文参考借鉴了王亲贤、陈建华等先生相关论述,特此表示衷心感谢!)

胡沙岸,资深媒体人、作家,现为楚天书局副总经理

## 在追光逐电中守护交通安全

◇ 杜志刚（口述） 章旷怡（整理）

**人物名片：**杜志刚，市政协委员，民盟市委副主委，民盟武汉理工大学委员会副主委，武汉理工大学交通工程系教授；中国照明学会交通运输照明和光信号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我在设计院做过三年施工与设计，后来来到武汉理工大学任教、做科研，同时还肩负着市政协委员、民盟市委副主委等身份。过往经历和多重身份让我明白，做科研不能闭门造车，要以应用为导向，要靠创造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求生存发展。

基于此，我始终秉持着“三味人才”的培养理念：在学术人、工程人、社会人三者之间做到相辅相成。我时常跟学生讲，要以工程为基础，在学术上进行深化，将学术成果应用到生产实践中，满足社会和国家需求，造福社会。

### 亦师亦友，不限三尺讲台

2007年，我从同济大学博士毕业。在校期间曾跟着导师做过一些关于隧道交通安全与照明节能方向的项目，从中发现一些很有特色的规律，引发我的学术兴趣，发表了系列研究成果。毕业后想继续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把之前做的许多成果延续下来，走科研的道路。

当时面试了华科大、华南理工、武汉理工三所高校，没想到和武汉理工交通工程系的老教授朱顺应交流得十分融洽，他的普通话发音和我一样，不是很标准，让人感觉特别亲切。我心想，终于找到组织了！同时也能感受到，武汉理工是一个包容性强、自由度高的好学校。

刚开始任教时，教授不同知识背景的

专业课程，对于年轻的老师来说确实是一个挑战。至今仍记得自己上第一堂课的情形：非常紧张，不懂得如何与学生互动，课堂氛围有些沉闷。为了上好每一门课，我反复温习教材，搜索不同的案例，给自己解压壮胆。秉持着“慢慢来”的态度，不断摸索、改进，课堂教学越来越自信，对交通工程学科体系的认知也更加全面准确。

作为高校老师，不能只在讲台上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引领学生心灵的成长，营造一个温馨的学习和成长环境。从三鲜豆皮到热干面，从武昌鱼到莲藕排骨汤，每个月我都会带着学生们出去品尝美食，和大家围坐在一起，分享着学术和生活上的点滴心得与疑惑。波光粼粼的东湖，微风拂面的江滩，静谧的奥山咖啡馆，都留下过我们团队骑行与欢聚的身影。

对待学生首先要尊重他们，还要走进心灵深处，与他们做朋友，了解支持他们。每个学生的情况都不一样，有些本身是“科研型”，有的则可以做“气氛组”；做科研有的偏向于学术类，有的则偏向于工程类。要善于挖掘每位学生身上的潜力，并提供机会让每一个人发光发热。

2011级的某位同学，本科从建筑学调到交通工程，综合测评排在全班倒数第7。在我这边读研时，性格相当强势，经常严厉批评师弟师妹们做事情马虎，没有科研态度，跟很多同学都搞不好关系。我时常找他谈心，劝说不要对同学过于苛责，他心情舒畅了很多，与同学们的关系也变得和睦。

随着身心的康复，他对科研也产生了浓厚兴趣，发表了本系第一篇SCI论文，授权多项发明专利，还获得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十大学术之星称号（2014年）、武汉理



与团队师生合影

工大学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荣誉。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厅工作，是武汉理工大新疆校友会副秘书长。

当老师其实就是这样，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盏灯照亮另一盏灯。我经常告诫学生们，要把眼光看得长远一些，不要太看重眼前的利益，你要实在，要有价值。当然这也是我校学生普遍的风格。出去碰到好多武理毕业生，特别是在基层干工作的，都比较能吃苦，在艰苦的岗位上能够站得住，不光有能力也很有想法，这些品质是很珍贵的。

### 追光逐电，聚焦隧道照明

人们开车进出隧道路段时，因为光线强度的变化存在明显的视觉差，导致出现一瞬间的视线缺失，会有短暂的“眼盲”感觉，我们称之为“黑洞效应”和“白洞效应”。从2004年开始，我就一直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用瞳孔变动来描述隧道“黑白洞效应”，找到帮助驾驶人适应“黑白洞效应”方案，提升其行车安全。



杜志刚（左一）带领团队在武汉路段调研

印象深刻的是2017年8月，在陕西安康秦岭1号隧道内，发生了一起大客车碰撞隧道口的交通事故，造成重大伤亡，令人痛惜。官方调查结果最后认定，该地管理所擅自关闭事发路段引道照明灯，是导致惨重后果的重要原因。这起事故为隧道交通安全敲响了警钟，对我个人的触动也非常大，我决心在隧道交通安全和照明节能领域深耕探索，努力在追光逐电中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出一份力。

做科研第一位是创新。“科研应该在丢钥匙的地方找钥匙，而不是在明亮的灯光下，即别人的研究光环下找钥匙。”我将心理学科知识引入隧道交通安全与照明节能领域，分析隧道路段黑白洞效应、边墙效应、出口松懈效应等不良心理效应的形成机理，从而找到调控和改进方法，减少交通隐患。

第二是需要坚持。现在有很多研究者功利主义泛滥，重短期成果、轻长期研究，如某研究短期成果不佳，就马上转去研究其他方向，这样做对科研发展极其不利。从科研的长期发展来看，难道只有第一名有意义，第二名第三名就都没意义？这种风气需要警惕。我们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不是为了和别人一样，而是为了和别人不一样，

做研究就更加如此。经过多年的深耕与坚持，我们科研小组已经成为在本领域发表论文和申请专利最多的团队之一。

第三是要以应用为导向。研究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更多要在工程应用。因为自己做过施工、设计，能切身感受到工程和学术上面存在的许多差异。现在很多人做的研究太过于追捧“热点”，这样对自己的发展、对学生的成长都十分不利；做了很多研究但可能没有一个项目投入应用，对社会来说也是资源的巨大浪费。经过多年的发展，隧道交通安全与照明节能已经成为了我们学校的特色专业，广泛应用到西南地区公路隧道、城市水下隧道、江底海底隧道中。

多年以来，我带领团队深入山区隧道实地调研已经成为常态。从武汉公铁隧道到长江隧道，从墨水湖大桥到武汉环线，从恩施城市道路到咸宁国省干线公路，我们对湖北省20多个事故多发路段进行过调研；还完成浙江、两广、云贵、山陕等地300多座隧道的调研与实验。每次调研都会针对现场实际情况，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许多成果已经应用到国内200多座公路隧道中。

时代在变化，行业未来也会面临许多新的挑战，随着“大基建”被陆续叫停，之后我们可能更多会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之前讲高科技，未来会更倾向于性价比，许多研究和工程也会更加务实、更加精细化。

### “顶天立地”，服务社会民生

交通领域的很多问题其实是一个社会共识的问题，需要让全社会都能够认识到，共同参与其中。作为长期从事这一领域的科研人员，要尽可能做到“顶天立地”。“立地”是要接地气，应用于工程实践，解决实

际问题；“顶天”是要做一些理论与方法层面的提升，形成一些普遍的、科学的认知。

从2017年开始，以“共享、公益、传承”为会议宗旨，我带领研究生发起、组织并承办了五届“华中地区道路交通安全研讨会”。通过这个平台，把高校、企业，还有交通管理和规划设计的一些部门单位集结在一起，搭建交通工程、交通管理、交通研究及教学的桥梁，互相促进互相帮助。还带领研究生们创建“守护交安天长地久”公众号及微信群，搭建传递交通安全知识、相互学习交流的平台。

作为一名民盟界别的政协委员，我也深感开展高质量政治协商、参政议政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要更加关注国计民生，积极反映基层急难愁盼问题，尽心尽力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堵点、难点、痛点。参政议政就是要参到点子上去，我就交通领域做的一些社情民意和政协提案都比较接地气，没有给人“高大上”的感觉，容易传播，老百姓可能也比较关注一些。

在当选市政协委员的3年多时间里，我提交的提案中有8件立案，反映的社情民意信息中有8条被民盟中央及省、市政协采用，部分信息还得到省市领导批示。

通过一系列调研我注意到，武汉道路中的双黄线横向宽度只有五十公分，而且不少设有三十八公分的隔离栏，隔离栏底座往往侵入双黄线，对道路安全存在隐患，因此提出《关于提升武汉市主干路中分带交通安全性的建议》社情民意，被市交管局应用于墨水湖大桥、长江二桥的交通安全改善中。我还参与了武汉市2022年政协1号重点提



杜志刚在政协大会上发言

案《关于加快同城化进程，打造武汉城市圈升级版的建议案》，并在2022年1月市政协大会上发言。

现在我正在准备两个提案：其一是关于提升城乡结合部电动自行车出行安全与效率的建议，建议在城乡结合部道路上添加非机动车道，以满足民众骑电动车出行需求，同时也保障交通安全；其二是关于非现场交通执法公正先行，构建电子监控系统规范化标准化新体系的建议。主要是针对交通执法罚款数额巨大且不断增长的现象，希望政府部门正确处理交通服务、交通管理、交通执法的关系，打造良好出行环境。

我们这代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些家国情怀，想为国家做一点事情。工程人的目的是通过工程项目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学术人是把这些实际经验不断总结提升，变成科研成果，如论文、专利；社会人是要为社会做贡献，帮助到更多的人，如参政议政、提案建言、科普工作。我时常和学生们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事情来做。在这三者之间寻求平衡，我一直在为此而努力。

## 缘聚江汉 共筑梦想

◇ 范宏彬

人物名片：范宏彬，江汉区政协常委，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武汉分所主管合伙人。

汇聚微光，点亮江汉政协大家庭

在人生长河中，都会有那么几段难忘的时光，它充满着意义和价值，让人生之路更加开阔。对我而言，这段时光便是与江汉政协结缘的日子。

我来自上海，因为工作原因来到武汉，有幸成为江汉区政协委员。随着时间流逝逐渐发现，这里是一个汇聚智慧、凝聚力量的地方，每一位政协干部都对江汉区的历史充满着感情，对江汉区的发展充满着激情；每位政协委员都是行业的佼佼者，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对江汉区的责任与担当。

在这里，我不仅见证了一个地方政协组织的蓬勃发展，更在其中找到了自我成长和实现梦想的舞台。

在江汉政协的大家庭里，我有幸参与了多项重要的议政活动。我们深入基层，倾听民声，了解民生。

有一年我们去满春街大夹社区考察，那是一个批发市场。刚到街区门口，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繁忙的人群物流和拥挤老旧的建筑，仿佛回到上世纪90年代早期。在居民楼顶层阳台上，大家观看居民自编自导的演出，期间我去了趟洗手间。

在穿越楼道的过程中，我看到长廊打扫得很整洁，居民物品摆放井然有序。公共洗手间也收拾得干干净净，完全没有“七十二家房客”的脏乱感受。并且，居民楼角落都种植着花草，让人感受到生活的美

好。通过与居民交谈，我了解到大楼里有志愿者参与治理和绿化。

这次考察让我大开眼界，没想到在一个商铺林立、建筑老旧、人员混杂，而且没有专业物业管理的社区，能呈现如此高质量的治理水平，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也因此有幸结识了当地社区干部。

此后我通过江汉政协这个平台，不断结识来自各行各业的优秀人士。他们的才华和热情深深感染了我，在与他们的交流碰撞中，我的视野不断拓宽，思想也得以升华。这些经历，不仅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更让我明白，一个人的力量或许有限，但当我们汇聚在一起，就能形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

### 提案发声，促进营商环境优化

区政协每年都会组织委员参加各种课题和专题会等活动。每次会议前我都会围绕主题做好充分准备，以便发言时做到言之有物。

在主持“厚植支柱产业优势，优化江汉产业版图”课题时，我通过一系列调研发现，江汉产业发展路径是升级主导产业、做大新兴产业、做好与民生相关的服务业，在超前谋划先导产业时需做好产城融合。

同时，我也提出厚植支柱产业优势重在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在产业发展中应扮演好“股东”角色，尊重市场规律、政策制定到位、资源整合有力，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急需优先发展的重点产业中。

提案是政协委员的重要职责。作为一名从事经济工作的专业人士，在撰写提案时会特别关心与经济相关的事项。记得2018年，我在上海见到一家星巴克，其

门面规模要远大于一般店面，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打听了一番后才知道，这是一家别出心裁的工厂店，将真实的厂房嵌入咖啡馆中，顾客们可以享受到独特的体验。后来又有机会了解到，这家星巴克工厂店能开业经营，是得益于当地政府在审批环节上的突破：在商业用地上允许建立工厂；在人流组织的场景下可以满足食品监管的要求。

这个案例让我深刻理解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意义，而那一年武汉也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的相关规定，这使我萌生写一篇关于优化营商环境提案的想法。之后，我进行了一些调研和访谈，发现政府相关部门是有在认真、务实地落实优化工作，特别在多证合一、容缺受理、一网通办等方面做得很有特色和成绩。

结合调研情况，我在持续深化对标改革、优化制度创新、优化精准服务和优化工作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建议，并根据当年年度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提出建立江汉区营商环境评价机制的建议。该提案结合其他委员的意见被作为重点提案，得到区委领导的重视并亲自进行督办。

随着优化营商环境被各级政府作为重要工作来推进，我也有幸能更有系统地调研武汉市的各个主管部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篇更为全面、细致的调研报告。该报告通过组织提交给中央统战部，并在2019年12月以中央统战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服务团、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代表人士服务团队的名义发表，得到各级领导的关注。

### 主持协商，改善协和周边交通环境

区政协为委员们提供了务实建言的平台和转化议政成果的舞台。为有序推进协和

医院周边交通环境改善，提升人民群众就医获得感、幸福感，2022年7月，江汉区新华街道联络委开展“改善环协和医院周边交通环境”专题协商会，并由我主持会议。

会前，新华街道联络委与我及相关政协委员做了详细调研，了解协和医院的停车位数量、扩建计划及难点、医院停车需求、周边停车位、共享单车管理、交通环境等与停车难、开车堵、乱停车等系列问题相关的情况，充分收集了第一手资料。

会上，针对协和医院、居民代表等提出的需求，相关政协委员根据具体问题和实际情况提出畅通协和内部微循环、错峰开设车辆进出通道、加快共享单车清运频次、探索智能交通运管模式、建设立体停车设施、挖潜周边停车资源等意见建议。交管、城管、园林等市区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做了积极回应。

本次协商活动通过政协搭台，市、区职能部门，市、区政协委员，街道、社区、辖区单位和居民代表实现了“面对面”交流、“零距离”互动。新颖的协商形式以及政协委员的高质量建议，使得环协和医院周边交通环境这一市、区长期以来关注的堵点、难点问题，得到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解决。我作为主持人深度参与本次协商活动，促进了江汉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这种参与感和成就感，让我深刻体会到作为一名政协委员的荣誉和责任。

作为江汉政协这个友爱大家庭中的一员，我始终胸怀对国家、对人民、对事业的



江汉区新华街道联络委开展“改善环协和医院周边交通环境”专题协商会

热爱和忠诚，这份情感已深深融入我的血脉之中。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通过江汉区政协的沟通协调和物流调派，我联系公司总部捐赠给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1000个医用防护面屏、16台紫外线负离子消毒机、16台正压式呼吸器及400多套替换配件，为江汉区四条街道和七个隔离点捐赠消毒液2.2吨，2000个医用防护面屏也送达武汉商学院校区医疗隔离点。此外，还从海外采购了35万件医用防护服、护目镜、一次性手套、防护围裙支持江汉区抗击疫情。

回首与江汉区政协一起经历的8年岁月，点点滴滴都令我感到荣幸与自豪。在这里，我不仅收获了知识和经验，更收获了友谊和成长。这是一段难忘的旅程，也是一份宝贵的财富，让我找到了信念的方向和奋斗的意义。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继续恪守一名政协委员的职责，为这片土地的美好明天而努力奋斗。

## 追光 27 年：热爱，是最美的答案

◇ 潘小平（口述） 闻 夕（整理）

**人物名片：**潘小平，湖北浙江总商会副会长、武汉市温州商会常务副会长，武汉天豪煌家灯饰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北省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武汉市企业家联合会副会长，硚口区人大代表、区工商联副主席。

我是温州人，在温州这个“含商量”极高的地方，我一方面受浓厚的经商氛围熏陶，另一方面被当地生产的诸多漂亮灯具所吸引。我热爱生活，热爱灯具，在我看来光象征生命，灯具是灵魂。灯因有形才有了灵魂，空间因光赋予生命力，两者缺一不可。

### 热爱——点亮人生“美学”生意

1997 年，下海经商风起潮涌，我辞去公职，和老公一起来到武汉开拓市场，在硚口区顺道街开了间 100 多平方米的门店。



天豪煌家灯饰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小平

店面很小，货品不多，我却有种圆梦的喜悦。从小就喜欢水晶灯，璀璨的灯光，映照出时光流转的美妙；温柔的灯光，烘托着合家团圆的欢乐。



美轮美奂的水晶灯

没有比创业更艰难的事，初期为了节省开支，身材瘦小的我采购、运输、销售一肩挑，所有事都亲力亲为。慢慢地，当年一起出道的老乡、同行，很多撑不住中途转道了，我却坚守了下来。

九省通衢、商贸繁盛的武汉，彼时高端灯饰市场仍是一片空白，我感觉这片空白就是为我留的，等我用光去充盈、去照亮。于是我瞄准高端市场，打造精品。我率先提出“灯饰体验式卖场”概念，依托水晶灯搭建生活场景，将灯光的设计感融入多元化消费体验环节之中，刷新武汉市民选购灯饰的传统观念，取得良好的市场反响。

我打造的卖场，一度成为华中地区规模最大、品种最全、档次最高的国际名品灯饰艺术中心，汇聚奥地利施华洛世奇水晶灯、捷克水晶灯、金达维沙华水晶、美国诺克、意大利琪朗、西班牙玛蒂娜等上百种全球名品灯饰，不但让消费者购买到全球最新的灯饰产品，还能感受到贵族式的奢华购灯环境。我们也是中国唯一一家代理施华洛世奇水晶灯的企业。

在武汉的27年里，我用灯光温暖了数十万个家庭的夜晚，点亮了武汉天地云廷、武汉CBD、金都汉宫、华侨城、万达御湖

世家以及武汉唯一的七星级酒店——万达瑞华酒店等城市奢华地标。

随着市场的变化，为了更精准覆盖更多的客户，我也不断调整灯光美学市场：针对年轻时尚族群，这里有雅诗兰黛、Ralph Lauren等国际时尚大牌御用设计师所设计的VC品牌灯饰；针对年龄层次更高、热爱艺术的高品质人群，我们在展厅专门设计一个禅意十足的茶室，定期邀约书画家做笔会，体验中国风灯饰之魅；针对重视生活体验的“技术控”型客户，我们将AI人工智能与灯饰紧密结合，设有专业的专业智能灯光设计团队来服务……人群的细分，意味着消费需求挖掘的更深度挖掘。

灯饰不仅是照明灯具，更倡导的是一种艺术生活。因为热爱，所以我愿意思考，愿意折腾。

### 服务——擦亮客户“满意”底色

27年来，我们积累了数十万高端用户，大量忠实拥趸的背后，依靠的不仅仅是品牌和品质，还有细致的服务：免费送货安装保洁、终身定期回访、保养维护，首创武汉灯饰行业的会员制服务，武汉高端圈子里，大多享受过天豪皇家的专业设计服务。



用餐场景灯光

在武汉的家居圈子里，平衡专业理念和商业运作从来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天豪煌家能坚持做有灵魂、有态度、有精神的品牌，核心就在于设计。

客户只需要输入自己的户型和风格，就能得到我们灯光设计团队专业的服务，能够轻松在一个空间里实现会客、工作、阅读、看电视等不同的灯光场景，减少光污染，更有 VR 眼镜帮助客户进行实景体验。

互联网时代实体经济艰难发展，我也一直在求变。如何平衡线上、线下“生意经”？我有自己的“独门秘诀”：设定另一种购物的方式——专业灯光设计的价值服务。这很大程度依赖于面对面的沟通，以及实体店面的体验。

线下销售有很多局限性，但线上销售也并非万能。线上销售的劣势在于：图片与实物差距明显，灯光效果无法直观体现，不容易运输等。那么，线下销售要做的就是取长补短，给顾客以极致的体验，让客户真真切切地体会到理想中家的模样。

尽管 3D 云设计需对每款灯饰进行建模，单个成本不低，但是 VR 体验效果与实际安装效果的吻合度高达 90% 以上，客户反响非常好。以服务换取口碑，我认为很值得。

### 创新——照亮未来美好生活之路

天豪煌家拥有 16000 多平方米的七星级体验馆，是目前华中地区极具影响力，集艺术灯饰、室内照明灯具、灯光设计、智能



家庭智能用光系统

家居、软装设计与售后服务于一体，零售服务与大型工程项目施工相结合的综合型公司。一路走来，有幸获得“名优企业”“百强企业”“武汉市优秀企业”“最受欢迎欧式灯饰品牌”“十大知名灯饰品牌”等荣誉称号。

耀眼的荣誉背后离不开审时度势、推陈出新。在充满变革的时代，唯适者生存，唯创新者生存。

近年来智能技术在各个领域不断应用，用户对生活智能化需求不断提高，空间智能化逐渐成为科技领域的新蓝海。面对新的发展形势，我们抢占先机，聚焦行业新质生产力，在武汉地区率先打造“华为全屋智能授权体验店”，成为华为全屋智能前沿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的授权合作伙伴。

华为在全屋智能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推出一系列重要场景的应用成果，包括华为全屋智能康养解决方案、华为全屋智能 5.0 地产行业解决方案、华为数字化办公解决方案。天豪煌家作为华为授权合作伙伴，全面深度融合其中，推动产品结构和服务方案全面应用华为成果，再一次走在科技、产品、服务全面融合的行业前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预计到2035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将超过3亿，且目前65.5%的老年人选择独立居住。人口老龄化是挑战更是机遇，“医养结合”势在必行且任重道远。

为抢抓机遇，我们将触角延伸至智慧康养社区、医院、学校、居家养老等业态，全方位多层次提供艺术灯饰、室内照明灯具、灯光设计、智能家居、软装设计的零售服务、系统集成与大型项目施工，打造智慧照明空间及养老服务新赛道，推出适合智慧生活需求的室内照明生态系统，赋能建筑空间智能跃变，助力居民实现“住更好房子”的梦想。

### 担当——展新时代企业家风采

怀着对灯光事业的热忱，我不断寻求新的突破，发掘灯光赋予生活的更多意义。作为一名企业家，赚钱只是附属品，更多的是对社会的担当。

当下，青少年儿童近视问题日益严重，近视率攀升、近视低龄化与重度化等问题，让家长愁眉不展，社会各界忧心不已。身为家庭的女主人、企业的带头人，我意识到，打造绿色健康光环境，还孩子一双明亮的眼睛，市场广阔，意义深远。

我们迅速组建专业团队，为每家每户有针对性打造科学合理的全屋灯光设计。为推广智能环保的照明理念，我们主动走进校园，改善教室照明，让孩子们努力学习的同时无忧成长。

与此同时，为满足不同生活场景细腻的灯光需求，我提出科学用光新概念，在



天豪门店

武汉率先成立最大的智能灯光体验馆，致力于把健康舒适的灯光传递给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提升灯光的品质，让健康光环境理念传播出去。

在灾难发生时，我通过捐款捐物等方式，向受灾地区和群众伸出援手。2008年汶川大地震、2010年玉树地震、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在每一个紧急关头，都有我和天豪煌家的身影。

我深知知识的力量，所以积极参加“寻找武汉20名贫困大学生”慈善活动，为“遇见未来”家庭教育公益云课堂提供资金支持等公益活动。发起成立楚天爱心公益基金、贫困大学生助学公益基金、湖北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用百分百的赤诚、实打实的行动，让伤痕累累的心灵得到抚慰，让渴求知识的眼眸中闪耀希望。

截至目前，我和天豪煌家累计捐赠款物价值超两百万元。未来，我将继续带领天豪煌家照亮更多美好城市，照亮更多人的美好生活。

开栏小语：2025年，我们将迎来中国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全民族14年艰苦卓绝，武汉作为抗战中心浴血荣光。为此，本刊开设“烽火江城”专栏，采取专题连载与约稿征集相结合的方式，多侧面反映武汉“战时首都”的历史场景与特殊贡献。本期特邀武汉著名城市研究学者涂文学开篇，同时诚盼文史工作者和广大市民大力支持。

## “保卫大武汉”：全面抗战的时代主旋律 ——“保卫大武汉”系列之一

◇ 涂文学

### 引言：1938年的武汉故事

如果推选1938年武汉的年度汉字，“热”字无疑是不二之选。这年夏天异常炎热，四月还是仲春，武汉即已闷热难耐。时值台儿庄大捷，武汉5万人集会游行庆祝，《新华日报》4月8日的报道说，游行队伍所到之处，“沿路的观众都狂热地鼓掌、欢呼，争先恐后地燃放鞭炮，把整个的街道都给浓密的烟雾弥漫了。虽然天气闷热异常，而又开始滴着雨点，但胜利的喜悦使群众忘记了

热，忘记了潮湿，挥着汗，嘶着喉咙冒雨行进”。进入7月，武汉的酷热程度更加显著，最高气温高达40度，并伴随着90%以上的湿度。日本军方承认，包括武汉在内的长江中下游异常湿热的气候，使其行军困难，体力不济，106师团113联队在湖口攻略战的时候，就有一半人掉队或中暑。其时中国媒体的报道，似乎可以对此予以佐证，如《上海日报》7月18日就曾以“长江天气炎热，日军攻汉困难”为题报道：“据中立国之军事观察家，最近对于中日战事之表示，一致认为日军攻汉战事，定必非常纾缓，而扬子



1938年，江汉路上的大幅宣传画“保卫大武汉”

江沿岸之天气炎热，洪水横流实为阻止日军前进之天然良机。”

与炎热的天气相伴随的，是炽热的战争气氛和热烈的爱国激情。当1937年岁末南京沦陷，国民党军政要员驻跸武汉，自1927年经历定都迁都的一番折腾后，武汉成为“事实上的抗战首都”。1938年1月郭沫若一到武汉，就深切感受到了这种气氛：“武汉三镇，自北伐以来，在刀光血影下已经窒息了整整十年”“沉睡了十年的武汉，似乎又在渐渐地恢复到它在北伐时代的气势了”“武汉三镇的确是复活了！谁能说人民是死了呢？谁能说铁血的镇压可以使人民永远窒息呢？那是有绝对弹性的气球，只有压力一松，它不仅立即恢复了原状，而且超过了原状”。他以诗人充满激情的笔触描写台儿庄大捷后武汉通宵达旦火炬大游行的火爆场面：“七号，消息传播开来，当天把那火炬游行提早举行。真个是家家庆祝，人人称贺。参加火炬游行的，通合武汉三镇，怕有四五十万人。特别是在武昌黄鹤楼下，被人众拥挤得水泄不通，轮渡的乘客

无法下船，火炬照红了长江两岸。唱歌声、爆竹声、高呼口号声，仿佛要把整个空间炸破”

（郭沫若《洪波曲》，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年，P28、53）。武汉的这种变化，也被嗅觉敏锐的记者捕捉到了，《申报》1月31日的报道说，这一年的农历春节，武汉街头已没有过年的喜庆气氛，“不但鞭炮声是绝对的没有，呼卢喝雉

的声音，也似乎不大听见。这与其说是政府取缔的功效，毋宁说是民众自动的感觉。因为，国际的强盗——日本，已经升堂入室，再不容许我们偷安了。街市上来往的人，大半带着沉郁而愤怒的神色。他们有的是战区来的难民，缅怀被敌人铁蹄蹂躏的故乡，他们当然没有心情来过这个废历年；就是原住武汉的人民，遭受敌机多次的空袭，也没有一个不充满了抗战的情绪。他们所贴的春联，十分之九，是带有刺激性的，他们革命之火，已在那里燃烧了！”

1938年的夏天，是被如火的骄阳和亢奋的情绪烘烤出的火热的季节。100多万中国军队在长江两岸、大别山麓与武装到了牙齿的侵略者进行了长达4个半月的殊死搏斗，团结起来的中国人在武汉书写着卓越而悲壮的战争故事：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与议会式的争论博弈，思想文化的空前自由与大量抗战文艺原创性作品蜂拥而出，盛况空前的群众集会与通宵达旦的火炬游行、戏院茶楼里的火爆义演、献金台前的慷慨解囊、征兵处的踊跃从军……1938年的武汉，亢奋

与消沉，希望与失望，胜利的喜悦与失败的沮丧，尽管是如此的矛盾、困惑和纠结，但在保卫大武汉的十个月里，武汉这座英雄之城，以孤注一掷的勇气，又一次举起有力的臂膀，撑起华夏半边天！

### “保卫大武汉”成为国共共识

1937年拍摄的电影《马路天使》有一个老王认字的情节，颇有点儿耐人寻味。这个繁体的“難”字，半边是才子佳人，另外的半边是半个汉口！这里隐含的意思是，上海、天津，当然也包括随后不久的南京，都被日本攻陷了，惟有武汉（汉口），成为未被日本占领的中国最大的中心城市。

这个意思在中共湖北省委1938年8月12日印发的《为纪念“八·一三”保卫武汉宣传大纲》也有表达：“武汉是中国剩下的一个最大的中心城市，是军事、政治、交通、经济、文化的中心，保卫武汉使我国能够更加增强抗战的力量，保卫武汉使我国能

够争取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时间来准备反攻日寇，保卫武汉使我国能够争取更大的国际同情和影响。”的确，南京沦陷后，保卫大武汉成为国共两党高度共识。

《新华日报》一连发表3篇社论，提出“保卫大武汉”！指出“在上海南京相继失陷之后，武汉无疑的成为全中国抗战的中心。日寇在完成其打通津浦线计划后，其第二期作战计划，必以夺取武汉为中心”“欲保卫武汉，必须先从前方去牵制和打击敌人，从野战中去消灭敌人，这才能争取时间，加强起大武汉的防卫力量，建立起新的军备，以准备决定胜负的战斗”。

7月5日，毛泽东等7名中共参政员在《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中提出，要“动员军力人力财力来保卫我们军事政治经济交通中心的大武汉”。10月10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辛亥、北伐与抗战》：“武汉是中华民国的诞生地，是大革命北伐时代的最高峰，现在又是全中华民族抗战的中心。”董必武在《武汉

的民众动员和组织》一文中，明确指出“保卫大武汉就成为目前政治上一个最迫切的任务”。他提出，只有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战，保卫大武汉的目标就能实现，“半年抗战，中国许多有名的大城市可以成为中国的马德里的，结果无一实现。武汉快要受到日寇铁蹄的蹂躏了，我们武汉的民众应使武汉成为中国的马德里。”

国民党方面的中央宣传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



1938年春，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撰写《论持久战》

会政治部，6月27日发表《抗战一周年纪念宣传大纲》，内有“保卫大武汉”口号。国民党军事指挥系统拟定的《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统帅部指导方案》指出，“武汉已为我抗战之政治经济及资源之中枢，故其得失关系至巨”，要“确保武汉而始终保持为我政治经济资源之中枢”。7月7日，蒋介石对全国发表演讲，提出“一切奋斗以拱卫武汉为中心，以达成中部会战胜利为目标”。7月4日，陈诚发表《以全力保卫大武汉——为国民二十七年抗战周年纪念作》文章，开宗明义：“我们应当从总结一年来宝贵经验教训中，来展开今后更伟大的斗争，尤其要以全力来保卫大武汉。”他在充分肯定武汉重要战略地位的基础上，表示誓死保卫大武汉，与武汉共存亡的决心，“今日武汉已成为第三期抗战中最重要的据点，这里是我们雪耻复仇的根据地，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石。今日全国民众，尤其是在武汉的每个军民，应当激发最大的同仇敌忾心，人人都下誓与武汉共存亡的决心，来守住这个重大的国防的堡垒，必能给予敌人以致命的打击，造成将来决战中及有利的形势”。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保卫大武汉”成为时代主旋律，由沙旅、尔东作词，郑律成作曲的《保卫大武汉》唱响大江南北，鼓舞和激励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参加抗战。抗战官兵唱着歌曲开赴前线，用血肉谱写一曲保卫大武汉的悲壮战歌：

热血沸腾在鄱阳，火花飞迸在长江，  
全国发出了暴烈的吼声，保卫大武汉！  
武汉是全国抗战的中心，武汉是今日最大的都会，  
我们要坚决地保卫着她，像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  
粉碎敌人的进攻，巩固抗日的战线，  
用我们无穷的威力，保卫大武汉！

### “速战速决”与“以空间换时间”

武汉特殊的战略地位和商业价值，久为日本所觊觎，“政治经济价值之大毋庸赘叙，在兵略上的价值也不可轻视”。早在1920年代，日本即开始谋划侵略武汉，“将该地方攻占，使中国断绝反抗日军之念，早出结果，十分重要”“攻占武汉有必然的意义”。抗日战争爆发尤其是南京沦陷后，攻占武汉（汉口），灭亡中国，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战略目标，“攻占汉口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从历史上看，只要攻占了汉口、广州，就能支配中国……通过这一作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的大半。……只要控制中原，实质上即能支配中国”。日本最先的如意算盘是，速战速决，在攻陷南京后，“一个月内逼近武汉”。

武汉会战前夕，日本人则计划“初秋即占领武汉”。日本参谋本部拟订的《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要点》，要求侵华日军“尽量缩短汉口作战和广州作战的时间间隔”，对“敌方兵力尽力给予重大损害”。日本的速战速决战略，源于其过分相信自己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对中国政府和军队抗战能力的轻视。诚如美国研究武汉抗战的学者麦金农所说，“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看，日本领导阶层显然不曾做过长远性的战略规划，军事策划者也没有预见到长期维持供给线的必要性。日军确信，只需用闪电战及令人可怕的战术方法，利用机动迅速、装备精良的机械化地面部队的强大火力，就能在短时间内导致蒋介石的垮台。显然，他们没有为持久战做准备”。

对于日本急欲攻占武汉的企图，中国方面了然于胸。叶剑英指出，“敌之沿江跃



1938年，周恩来、邓颖超在武昌珞珈山寓所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童小鹏摄

进，直取武汉的企图，是直接联系着敌人总的战略方针——速战速决”。为打破日本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中国军队制订了坚持持久战，以空间换时间的应对策略，即“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

鉴于武汉作为特大城市并自身不易防守，国民党最高统帅部制定了“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战略方针：“武汉已为我抗战之政治、经济及资源之中枢，故其得失关系至巨。惟武汉三镇之不易守，而武汉近郊尤以江北方面之无险可守尽人而知，更以中隔大江外杂湖沼，尤非可久战之地，故欲确保武汉，则应东守宿松、太湖，北扼双门关、大胜关、武胜关诸险，依大别山脉以拒敌军，并与平汉北段之积极行动相呼应。若敌悬军深入，则可临机予以各个击破，或在大别山

预为隐伏待其深入，出奇兵以腰击之。如此方可制胜，方可以确保武汉，否则据三镇而守、于近郊而战，则武汉对我政治、经济资源上之重要性已失所保者，仅此一片焦土而已矣，且受敌之包围，则势如瓮中之鳖，困守南京之教训实殷鉴之不远。故欲确保武汉，而始终保持武汉为我政治、经济资源之中枢，则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是为上策。”因此，武汉保卫战的计划和任务是“把重点放在外翼，争取行动上的自由，预期可与敌人的主力作战四至六个月，予敌于最大的消耗，粉碎其继续进攻之能力”。

日本对于中国的这种战略及在武汉外围的布防也多有所了解，认为武汉的防线堪比马奇诺防线，武汉战役实际上是一种“要塞攻击”：“华方以武汉为中心，集中了一百几十个师，在大江以南确切的保持着南昌——面前摆着一个大障碍物鄱阳湖，并由南昌经过德安、庐山、九江越过长江，沿湖北、安徽省境以与大别山相接，然后再向左转直达西部的信阳，构成一个长一百几十里的大战线，并且施设了几层近代式的要塞，差不多已把武汉化成一座难攻不落的城寨。并且在第一线之后，更布有第二线与第三线，利用大别山和江南的幕阜、九岭两个山脉以及附近的河川，造成一条铁壁，实可称为‘远东’的马奇诺线了。所以武汉攻略战是一种要塞攻击，也可以说是和那种对阵数年的所谓‘西线无战事’的西部战线一样了。”

中共对于武汉抗战的主张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系统阐述“中国抗战是一场持久战”的重要思想。具体到武汉会战，1938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对国民党的军事建

议书，提出在正面和侧翼采用运动战和阵地战，尽量使敌之进攻延缓或停顿，同时在敌侧后发动广大的游击战，牵制和消耗敌人，使之不能集中全力于正面进攻。简言之，即“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助以游击战”。这一战略方针，在战略防御阶段将三种具体作战形式之间的内在关系作出了科学论证，体现了持久战略总方针的精神实质，为国民党军事指挥机构制定武汉会战具体作战方案，提供了重要参照，促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消极防守、被动挨打的局面。

### 中日双方兵力部署与作战序列

日本图谋占据武汉由来已久。早在1923年，日本驻华公使武官林弥三吉，曾向日本参谋总长、陆军大臣与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提交报告，建议从溯江西进和沿平汉路南下两条路线进军武汉，并具体分析了两条进攻路线的利弊，基本倾向于南下进攻路线。林弥三吉的这个报告，对后来日军进攻武汉战略制定与实际行动产生了很大影响。日本大本营最初方案采用的是南北牵制、两翼包围的战略，分南北两路沿津浦线进攻，使晋豫之兵与江南之兵会师中原，击败中国军队主力，并以平津、宁沪杭为两翼，南下与西进会攻武汉。

中方识破了日军南北牵制、两翼包围的战略意图，《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统帅部指导方案》作出如下之分析和判断：

按目前敌之行动而判断，其最近之企图在先求打通津浦线已甚显然。惟敌人打通津浦线后当以郑州及武汉为其作战目标，且判断其侵袭郑州及武汉之路线约有三：

(1) 以一路沿陇海线西进图取郑州，

以断我平汉线之联络，同时安阳方面之敌沿平汉路南下，以夹击黄河北岸之我军。

(2) 以一路由合肥经六安、潢川趋信阳，以图截断平汉线，再转而南下进逼武汉，或待陇海一路占领郑州后，再沿平汉线南下攻敌信阳、武胜关，同时以一路由合肥、六安经商城、潢川，再南转经麻城、黄安，与平汉路之敌会攻武汉。

(3) 以一路沿长江北岸经大别山脉南麓，由安庆、太湖、宿松、黄梅与海军协同会攻武汉。

为制止日军过早沿江西上或沿平汉线南下直击武汉，中方并未立即直接将国军主力配置于黄河以南的河南地区或沿江重叠布防，阻止敌军沿江西进，而是将重兵集中于徐州外围并发动了徐州会战。徐州会战之后，日本华北方面军沿陇海路行进，于6月6日占领开封，进而欲渡黄河占领郑州，然后沿平汉路南下直取武汉，形势十分危急。6月5日、7日，蒋介石命令第20集团军两次炸开黄河花园口堤坝，滔滔黄河水如脱缰的野马，越过陇海线经中牟、朱仙镇、尉氏、扶沟沿贾鲁河进入安徽，流入淮河、运河而奔向长江，豫、皖、苏三省40余县顿成泽国，被淹耕地1900余万亩，80多万人葬身鱼腹，近600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衍成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黄河决堤也使日军遭受重大损失，新郑附近的一支400余骑的骑兵支队全军覆没，大批战车、大炮和辎重物质被大水淹没；中牟、尉氏之敌被迫撤回开封杞县一带，机械化部队因豫东平原一片泽国而无法展开行动。日军被迫改变作战计划，原准备占领郑州进而南下进攻武汉的华北方面军调整行动方向，沿津浦路南下加入了准备沿江西进的畑俊六的华中派遣军，在畑俊



1938年，美国《生活周刊》封面“保卫中国的战士” 罗伯特·卡帕摄

六的总指挥下沿江西进，进攻武汉。“黄河决口，使得淮河泛滥，作战军主力若利用淮河水运前进实为困难，因而确定主力沿扬子江前进。”

日军作战路线和军力安排是，以华北方面军第2军于大别山北麓地区作战，从津浦线合肥出发，进攻六安、霍山，再向大别山进犯，直趋信阳，切断平汉线，迂回武汉之北，转攻武汉；以华中派遣军第11军沿长江南北两岸西进武汉。日本大本营对华中派遣军下达的作战命令，要求其“与海军协同，攻略占据汉口附近之要地，于此期间，力求击破多数之敌，攻略汉口附近后之占据地域，力求予以紧缩”。

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预判，日军在花园口决堤后必将以主力沿长江两岸西进和在大别山北麓迂回进攻武汉，于6月中旬制定相应作战计划并组编军队，将武汉卫戍总部改编为第九战区负责长江南岸之作战，

以陈诚为司令长官；而江北及大别山北麓则由李宗仁为司令长官的第五战区负责。第九战区包括薛岳的第一兵团、张发奎的第二兵团、孙连仲的第三兵团等。第五战区包括孙连仲的第三兵团、李品仙的第四兵团、张自忠的第二十七军团以及徐源泉的第二十六集团军、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团军、韩德勤的第二十四集团军、杨森的第二十七集团军、王瓚绪的第二十九集团军等。

总体而言，武汉会战时期中日双方军力对比，中国军队在数量上呈相对优势，共110余万人，其中第九战区70余万人、第五战区45万人。日本军队共20万人，二者数量对比将近6:1。但是在武器装备上，日方则具有绝对优势，使用小型武器（长短枪、机枪、手榴弹甚至大刀）的中国军队与拥有飞机、舰船、机动车和大炮的日本军队作战，几乎毫无胜算。然而，武器是战争重要的因素，但却不是决定的因素，关键还在人——爱国与民族精神的激励，坚忍不拔的斗争意志，视死如归的拼搏精神以及灵活多变的战争艺术……不然，“那我们怎么来解释1938年那长达十个多月里，在面对日军军事上占优势的情况下，中国军队在长江中游取得了这场精神上的保卫战胜利呢？”

涂文学，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 1938年“美国秘闻”中的武汉抗战

◇ 孙君恒 王富林

1938年，中国抗战形势严峻，迫切需要有利的国际环境。2月，毛泽东在与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K·T·Wang）谈话时明确指出：“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中国抗日斗争的声援，这些都是我们所欢迎与感谢的……现在，是中美两国及其他一切反对侵略威胁的国家更进一步联合对敌的时候了。”

1938年，一批美国记者、外交官、军事观察员关注和帮助中国抗战，他们从亲身经历的视角，客观全面地披露抗战实情，高度赞扬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抗战的作为。由此，美国政府逐步由观望转向参与、支持中国抗战，对华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经济援助也得到加强。

美国记者、外交官、军事观察员当年的报道和报告，形成“美国秘闻”档案，非常独到，弥足珍贵，留下了抗战时期中美关系的记录，也是武汉抗日统一战线难忘的一页。

### 记者、外交官反映客观真相

1938年，美国记者、外交官汇集中国战时首都武汉，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1950）、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1885—1970）、斯诺（Edgar Snow，1905—1972）、卡尔逊（Evans Fordyce Carlson，1896—1947）、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1908—1999）等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著名记者斯诺、斯特朗、史



斯诺《红星照耀中国》及书中地图、照片

沫特莱更为活跃，因为他们的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都以S开头，合称“3S”而留名史册。史沫特莱在汉口居住近一年，笔下对汉口——东方的芝加哥的喜爱溢于言表。

美国政府与媒体记者，对在陕北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坚持抗战、促成抗日统一战线充满好奇，希望看到异军突起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积极投入抗击日本侵略中国的真实情况。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和外交官戴维斯等，纷纷从汉口前往延安和北方实地考察，打探究竟。

斯诺等美国记者的报道，客观反映了抗日统一战线下共产党、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事实，对国民党暗箱操作干扰、阻挠、破坏统一战线有所揭露，从侧面证明了齐心协力、同仇敌忾是抗战胜利的重要法宝。中共在统一战线上坚持独立自主、高度警惕是完全正确的。长期研究中国抗战的美国学者麦金农指出：“这批驻华的美国记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美关系。”

卡尔逊，是同美国总统罗斯福有不寻常关系的外交官。1938年，他在汉口多次写信给罗斯福，通过总统私人女秘书玛格丽特·莱汉德转达，具体谈到中国的真实情况。3月4日，他于汉口美国领事馆写信给罗斯

福说，中国共产党坦诚相见，真诚合作，致力于中国民主政府建设。

卡尔逊对共产党的“共同合作”口号非常赞同，并预言一个和谐、统一、民主的中国将战胜日本，呼吁美国停止向日本出售战争物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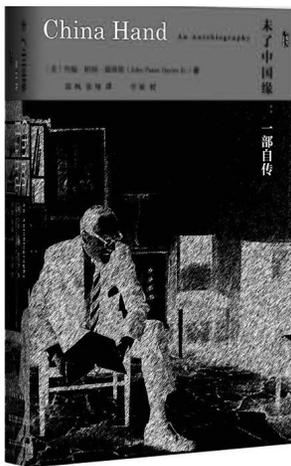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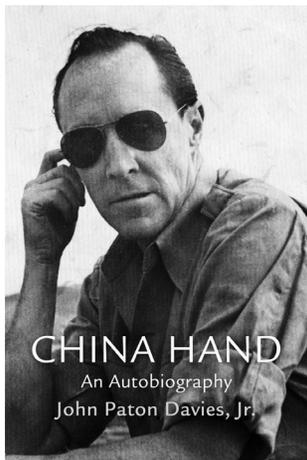
卡尔逊从延安到汉口，看到共产党军队和游击队非凡的团队精神、严格的纪律和



史沫特莱（左1）、博世哈德、卡帕和卡尔逊（右1）在汉口



中国汉口抗战新闻（美国1938）



戴维斯自传《未了中国缘》英文版 / 中文版

对平民的关怀，留下深刻的印象，迅速报告给罗斯福，说共产主义士兵的勇敢行为与颓废的国民党军队形成鲜明对比。卡尔逊对红军的想法，引起了美国军方高层的注意。

戴维斯是第一批与毛泽东会面和交谈的美国人之一，作为战时东亚和南亚盟军司令史迪威（General Joseph Stilwell）的助手，其自传《中国之手》（中译本为《未了中国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成为2012年美国外交学会道格拉斯·狄龙奖获得者。该书披露，卡尔逊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喜欢的军官，公开赞扬中共，对中共的“共同合作”口号非常赞同。卡尔逊回到美国海军陆战队后，直接参加了二战，在训练中还吸取了中共正规军和非正规军的经验教训。

### 陈纳德、卡尔逊提供秘密情报

美国非常关注武汉的抗战情况。美国国防部解密的英文档案，就表现了这一关切，包括陈纳德、卡尔逊提供的军事情报等，部分存放在美国南

加州大学。这些中国抗战解密档案（扫描件），提供了武汉抗战军事秘密第一手可靠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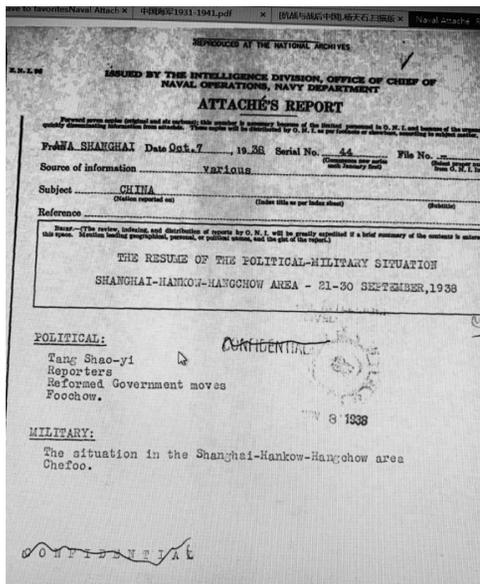
第一，关于中国空军。

陈纳德向美国国防部报告1938年1月1日至5月31日的中国军事情况，有12页之多，涵盖中日空战细节，披露了新飞机抵达中国、中国飞行员的训练期、数次对日空战、中国航空委员会重组等内容。

陈纳德的报告说，中国只有不到125架飞机，进口飞机主要来自苏联、英国、法国，具体型号、数量都清清楚楚，并聘请英、法、德、意、苏等国教练。报告指出了中国空军“病急乱求医”的混乱情况，其中意大利飞机非常老旧，根本无济于事，同时十分缺乏轰炸机。自1938年1月以来加速空军建设，新机场已经在重庆、昆明等地准备建设。苏联秘密为中国提供空军人员在汉口的活动，也被其发现。



朱德与卡尔逊



美国南加州大学的中国抗战解密档案

## 第二，关于八路军。

第一个到达延安的美国军官卡尔逊，1938年3月在汉口美国领事馆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说：“共产党集团对于统一战线（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联盟，主要目的是抵抗日本侵略）和中华民国及人民的领导蒋介石委员长是相当忠诚的”“朱德告诉我，战争过后，共产党还是想和国民党保持友好谅解。”

卡尔逊8月在汉口写信给斯诺说，共产党人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脊梁，“让西方世界尊重中共的地位，中共当之无愧应该得到这份尊重”。卡尔逊给美国国防部的秘密报告，讲述了他所看到的八路军，纪律严明，艰苦朴素，同心同德奔赴抗战一线，平型关大捷赫赫有名，是大有希望的军队。

## 第三，关于武汉——广州铁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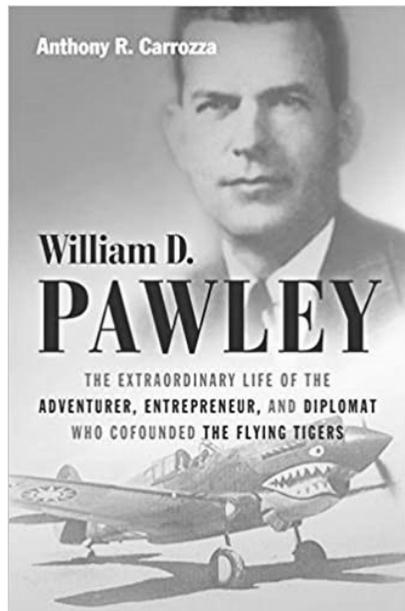
1938年中国北方被日本占领，武汉到广州、香港只有铁路运输能力较大，美国对此特别关注。秘密情报统计数字显示，由于日军飞机轰炸，武汉到广州的运输受到很大影响，运输时间延长很多。

## 第四，关于武汉保卫战。

每周，美国方面从武汉接到快报，对中日交战具体情况了如指掌。1938年10月1—10日的情报说，日本军队没有完全占据蕪春，长江洪水造成了供应困难。中国方面从蕪春撤军，日本的海军势力范围，在汉口下面大约78英里的黄石港和石灰窑地区。在长江以南，日本军队继续活动，沿着南岸前进。第一个障碍是阳新半壁山布防了大量阵地堡垒。日本部队向南到阳新，首先必须通过富河。在阳新地区，中国军队受到了来自北方的日本军事攻击，许多地方都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军事地图标注的军事目标、双方布局，也历历在目。

## 秘密销售飞机与飞虎队参战

美国商业公司希望通过秘密销售飞机，达到中美之间的互惠互利。美国传记作家卡洛扎（Anthony R. Carrozza）着眼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影响国际关系的关键人物，写



《威廉·D·波利》英文版

下了《威廉·D·波利——共同创立飞虎队的冒险家、企业家和外交家的非凡人生》一书（2012年英文版，尚未有中文版），介绍了波利作为柯蒂斯-赖特公司的销售代表前往中国，并将自己定位为中国政府美国军用飞机的唯一来源，穿梭于中国官方、美国公司与美国志愿者飞虎队之间，进行秘密沟通联系和商业贸易。

书中披露：1938年2月11日，孔祥熙召开一次秘密会议商谈购买飞机，应邀出席的是：美国飞机推销员、中国航空集团公司（CNAC）董事波林（Max S.Polin）、蒋介石的政治顾问威廉·亨利·端纳（William Henry Donald）以及北美航空、联合航飞、普惠公司和汉密尔顿标准公司的销售代表霍华德·诺里斯（Howard Norris）等。中国政府签订了购买35架柯蒂斯-赖特（Curtiss-Wright）飞机的合同，并正与其他美国公司考虑几个飞机订单。波利（Pawley）已经向中国出售了60多架柯蒂斯鹰（Curtiss Hawks）和30架新的莫霍克（Mohawk）追逐机（1938年5月至8月交付，每架30888美元）。

有飞机，才能开飞机。美国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参与了1938年武汉对日空中作战。他与当时负责航空事务的宋美龄交往很多，大力支持中国空军建设，不仅完善汉口王家墩机场，还筹备湖南芷江机场、云南昆明机场和航空学校等。中国主动邀请和招募外国飞行员加入中国空军，早已预订了30名退伍志愿者加入飞虎队，这为后来飞虎队的正式投入战斗奠定了基础。

其实，陈纳德在1937年就参与了中国抗日，“他愿意提供帮助……他渴望参战也不无个人的原因，战争很适合他好斗的天性‘我从不逃避战斗’。”美国飞虎队早



《少数给中国的飞机》中文版

期参与者布鲁斯·莱顿的外孙女尤金妮·巴肯（Eugenie Buchan）女士，是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博士，其著作《飞虎队的诞生——少数给中国的飞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4月中文版）披露，自中日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在观察和等待中日事态发展，转向大力参与。

#### 民间和宗教界开展人道援助

1938年，斯特朗在美国到处演说，支援中国抗战，认为这是出于道义。她不辞辛苦，不顾精神失常的父亲，表现出高尚的国际主义精神。“路易斯此后六个多月的活动，使她撇开了她那精神失常的父亲……自己又急匆匆地在全国各地旅行演讲……华盛顿听众热情地支持她的见解。她还同他们讨论了她那为发展中国工业而组织大量筹措资金活动的计划。”

1938年，美国人士也往往通过教会、教堂渠道，进行中美之间的实质性直接合作与交易，包括飞虎队和中国工业合作社，

其中的活跃人员是《时代与生活》出版商亨利·卢斯、作家海伦·福斯特·斯诺、国会议员暨来过中国的传教士沃尔特·贾德等。

美国民间也为中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救助难民。1938年2月4日，《申报》（汉口版）《各国基督徒同情我国抗战》报道“美国基督教会、新加坡华侨信徒的慰问电和募款。”史沫特莱深有体会：“我碰到了二三十位传教士，并给他们介绍了八路军的情况和所需要的药品。这些传教士很多都热心于救死扶伤的工作。他们全都是中国的朋友，深切地同情中国军、民的斗争。”

共产党善于广交朋友，有口皆碑。周恩来的朋友鲁兹（Logan Herbert Roots，1870—1945）中文名吴德施，为美国圣公会主教。“主教的家变成了汉口的统一战线会议地点。”

吴德施家里，午餐会高朋满座，他的家被称为“莫斯科——天堂轴心”。前来的客人中有周恩来、国民党官员、外交官、记者等。人们畅所欲言，滔滔不绝地谈论着八路军的功绩，而斯特朗则分析着从马德里到莫斯科的国际形势。

1938年1月18日，武汉天主教会的和平弥撒成功举办。“国民党各界人士纷纷参与其中，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副司令员彭德怀也分别赠送了‘成仁取义’和‘虽死犹生’的锦旗。新华日报社、中央通讯社对此追悼活动都作了专题报道。”

华裔美国人捐款，在美国十分普遍。1938年，洛杉矶华裔社区在老唐人街举办中秋节，为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华裔受害者筹款。当年的中秋节，是在联合车站的建设拆除了旧唐人街大部分地区和全美各地的米饭筹款活动的背景下举行的，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游客来到旧唐人街，同时为当地的华裔

美国人提供了一个舞台，让他们向游客展示唐人街的自我表现。

美国募金救济难民，通过驻华大使詹森等负责传递。“华盛顿廿七日中央社合众电”说，美国红十字会总会专门宣布，聘美国驻华大使詹森为救济中国难民基金会名誉主席、驻上海总领事为名誉副主席、英美烟草公司高级职员勃塞脱少校为主席、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安诺德等为委员。总统罗斯福帮助招募了百万美金，同情和帮助中国难民，使中国各界十分感动，致谢的话语见诸报端。

1938年的武汉抗日，成为中国与国际友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动，轰轰烈烈，载入史册。

本研究为武汉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课题“1938年武汉统一战线回顾及启示”基金项目（项目编号：whtz202430）

孙君恒，武汉科技大学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富林，武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 刘伯垂：武汉早期党组织的创建者

◇ 刘旺琳 田子渝

武汉早期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七个地方组织之一。刘伯垂，这个被历史尘埃长期淹没的人物，是武汉地区党组织的创



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刘伯垂墓

建者。2024年11月，鄂州市委举办“鄂州三杰”（范鸿劼、刘伯垂、赵子俊）座谈会，缅怀从鄂州走出去的三位中共早期党员。

今年是刘伯垂诞辰138周年，让我们翻开历史追寻其足迹，以纪念这位建党有功的革命先驱。

### 发起创办《惟民周刊》传播社会主义

刘伯垂(1887—1936)，名馨笏，字伯垂，号笏祥，册名芬，笔名“恶紫”。湖北鄂城（今湖北省鄂州市）段店镇刘弄村人。清末留学日本，就读明治大学法科，结识孙中山、陈独秀，参加中国同盟会，从事反清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后，刘伯垂回国，历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参事、广东军政府高等审判厅厅长等职。1919年8月10日，与旅粤同乡胡祖舜、范鸿劼、张知本等发起创办《惟



刘伯垂 (1887—1936)

民周刊》。刊名“惟民”即英语“Democracy”的译名，当时流行的音译名是“德谟克拉西”，“则有‘民权’‘民主’‘民本’‘民治’‘民众’‘平民’‘庶民’‘唯民’之殊称”<sup>[1]</sup>。

《惟民周刊》以阐发民主、谋政治社会的根本改革为主旨，宣扬所谓西方新学为广义的思想新潮，既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潮，也有无政府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等社会主义思潮。特别是五四运动时期，社会主义“日新月异”为“最流行之名词”<sup>[2]</sup>，故成为《惟民周刊》宣传的重要内容，发表了《说“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我》《社会主义之分析论》《列宁教育的设施》《今后劳动界必要的组合》等文，传播社会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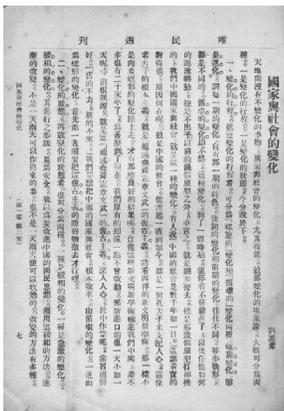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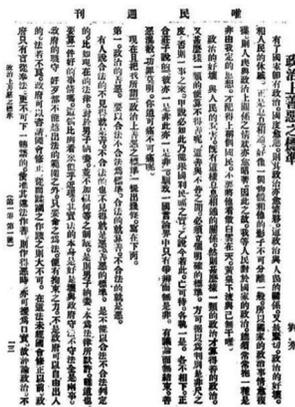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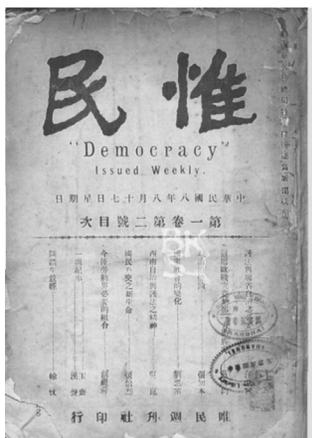
这些文章指出，所谓社会主义是反对

财产私有，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实现社会平等，但因实现手段不同而分出“共产主义”“集产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流派。当今最流行的是马克思主义，它以劳动者为本位，主张废除资本主义，用政治之势力（引者注：即用阶级斗争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生产资料国有，进行平均分配，“现在德之社会民主党，俄之过激党皆属于此”<sup>[3]</sup>。俄国的过激党，即布尔什维克为“人类真正幸福，不出十年，必要实现的。吾人不幸生在东方，却有幸有这主义，什么恶魔，什么军阀，都不必问他，倒先要问我……这社会主义比如春风吹草，一到元阳开泰……自然发扬起来”，如果我不自觉跟着世界大势，身体力行，“那就会被社会淘汰”<sup>[4]</sup>。

上述文字发表于1919年9月7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彰显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宣传社会主义之初，就确定中国要以布尔什维克主义为救国真理，如果不遵循布尔什维克主义将被历史淘汰。这段文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早的表述之一。

刘伯垂的《国家与社会的变化》《政治上善恶之标准》《文学与时代》，是他在五四时期留存在世的仅有文字，凸显了他早期思想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发展的轨迹。

《国家与社会的变化》<sup>[5]</sup>解析近代中国落后腐败的根本原因是“‘祖述舜尧宪章文武’的复古主义”，要



改造国家与社会，需在思想上采取“缓和的手段”，对国民进行国民教育和传播西学新思潮；在政治上采取“激进的手段”“轰轰烈烈的从根本上改造”。“根本的改造”表明他的新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萌芽，与改良主义划清界限。

《政治上善恶之标准》<sup>[6]</sup>阐释了他的早期政法观，确立政治上善恶的标准有三个。一是政治上的善恶要以合法不合法为标准。批驳了政府是法的体现者和执行者，强调政府也必须按照“约法”来执行国家的职能。二是政治上的善恶要以合不合社会进化的行程为标准。“社会进化”即“社会进步”，是当时通常的话语。这个标准就是强调政治必须推动社会进步。他指出社会生产资料的公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对社会流行的中国井田制度早已实行了这种制度的说法加以驳斥，指出井田制度是封建统治者“独占土地的一种阶级制度”，与以推动社会进步的“土地国有”“膺背相反”，是复古的鬼话。三是政治上的善恶要以趋重民权与否为标准。驳斥了政府代表法，指出国权要由政府掌握的论调是“君主专制时代之遗策”，现代政府必须执行民权，不能独断，“民权愈伸张，政治的进步愈越进”。

《文学与时代》<sup>[7]</sup>指出文学语言是时代的产物，“文字是语言的留声机”，旧文学旧文字旧语言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二十世纪的人不说二十世纪的话，不做二十世纪的文，偏要逆转命运，说那几千年前的死话，做那几千年前的古文，你道迂腐不迂腐，好笑不好笑”。

不必讳言，这三篇文章主流是宣扬资产阶级民主，但中国必须顺应社会发展规律，实现生产资料公有；中国政治社会的改变，要用革命的手段进行根本的改造；民

众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好坏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息息相关；文学有时代性；天地间万物无不“螺旋的”变化进步等思想，蕴含着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元素，彰显出刘伯垂早期思想随着时代思潮前进的步伐。

### 参加创建党组织积极开展活动

1920年夏秋之交，刘伯垂辞去广东军阀政府的职务到上海，经陈独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最早成员之一。因他是湖北籍，由陈独秀、李汉俊派回武昌筹建武汉党组织。

刘伯垂返回桑梓，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李汉俊介绍董必武入党，接着与董必武再介绍张国恩、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等入党。

1920年10月，刘伯垂与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等7人，在武昌抚院街（今民主路）董必武、张国恩的寓所暨律师事务所开会。首先由刘伯垂介绍上海早期党组织的情况，传阅从上海带回的党纲草案。经过热烈讨论，会议决定成立中共武汉早期组织，公推包惠僧为书记。会后在多公祠5号设立党的秘密机关，对外为刘芬（伯垂）律师事务所，以作掩护。

武汉早期党组织，是继上海（1920年6月）、北京党组织（1920年10月）之后成立的第三个党组织，有力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与武汉地区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华中地区革命形势焕然一新。

在刘伯垂与董必武、包惠僧等的领导下，武汉党组织积极展开活动。

首先，进行组织建设。

先后吸收赵子俊、刘子通、黄负生、项德隆（项英）、林祥谦、李书渠、林育南、



上图左起：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  
下图左起：张国恩、郑凯卿、赵子建

林育英（张浩）、施洋等一批党员，使武汉地区成为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阵地。

其次，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0年11月7日，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会议在武昌私立武汉中学举行，由刘伯垂与包惠僧、董必武、陈潭秋等发起。在14日的第二次会议上，刘伯垂就社会主义作专题发言。他说：“社会主义力图消灭旧社会中存在的过于悬殊的阶级差别。工人辛辛苦苦地挣来的工资，却无法维持他们吃饱穿暖，而那些什么活也不干的人，却穿绸缎，占有好几处住房。正是由于有这种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悲惨现象，称之为阶级斗争的社会运动便发生了。原料在没有经过加工之前是不具有任何价值的，原料只是在被加工之后才具有价值。譬如，一棵树，就是原料。在未被加工时，它是一点价值也没有的。某个物品，花费在它上面的纯粹劳动越多，它的价值越高。总之，我们看到，物品的价格是随着加工它所需要的劳动量的增多而提高的。企业资本家所获得的财富是雇佣工人劳动的成果，是榨取剩余价值

的结果。既然在旧社会里存在着如此不平等的现象，那么，诸位就该想一想，怎么样去消灭它。唯一的办法就是组织总罢工，以便不给资本家以掠得剩余价值的可能。然而，罢工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情，因为，如果工人没有积攒的话，那他们在罢工期间就得挨饿，这样也就不可能长时间地坚持罢工。自然，如有像英国工联那样专为罢工而设立的救济机构，则是最好不过的了。对铁路工人联合会这一强有力的工具，工人们尚无所知晓。我们的职责，是当他们的领导者。为达此目的，我们应当尽快地获得知识，研究社会主义和组织联合会的方法。我们应该仔细地研读涉及上述问题的杂志和书籍，并在我们的会议上对这些问题也展开讨论。”<sup>[8]</sup>

在刘伯垂与董必武、包惠僧等的领导下，党团组织积极在青年学生中开展活动。武汉中学的建立，成为武汉地区党团组织的公开活动基地。他们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青年学生和工人中组织学习《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等书籍和《共产党》《新青年》等革命刊物，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指导、声援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的徐全直、杨子烈、夏之栩等进步学生反对封建教育制度、反对封建礼教的“女师学潮”，进一步掀起了社会反对军阀、反对封建专制的爱国运动。

第三，组织工人阶级积极开展反对军阀与资产阶级的斗争。

武汉有10万产业工人，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集中地之一。在刘伯垂与董必武、包惠僧、林育南等的领导下，武汉地区工人运动蓬勃开展，很快形成高潮。先后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汉口人力车夫公会、汉阳钢铁厂工会、武汉工团联合会、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联合会、湖北全省工团联

合会（全国最早成立的地方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全国最大的跨地区产业工会）、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等工会基层组织，组织徐家棚粤汉铁路机车处工人大罢工、汉口租界人力车夫罢工、硚口英美烟厂工人大罢工等工人斗争，一开湖北地区工人运动的新纪元。

1923年4月，武汉江岸拉响了举世闻名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汽笛，将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推向“令人不可逼视的狂潮”<sup>[9]</sup>。

### 投身大革命洪流担当重任

在共产国际与苏联的指导与帮助下，第一次国共合作掀开了大革命的序幕。根据党内分工，董必武（同时负责统一战线工作）、陈潭秋负责党的工作，刘伯垂负责与国民党合作的统一战线工作。

1923年12月，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筹备处成立，刘伯垂、廖乾五等人负责。

1924年1月，刘伯垂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见证了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的历史盛会。3月底，刘伯垂与林伯渠等人组建国民党汉口执行部，直辖湖北、湖南、陕西三省国民党党务，刘伯垂担任执行部工农部长。5月，湖北直系军阀萧耀南制造了“汉口之党狱”，将刘伯垂等国民党汉口执行部要员逮捕。《向导》周报谴责直系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指出第一次国共合作彰显共产党与国民党“为中华民族独立奋斗的精神与决心”，获得全国民众的同情与拥护，直系军阀镇压汉口国民党执行部，实际上是摧残国民革命，帮助帝国主义“压迫中华民族”。

<sup>[10]</sup>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出第14号通告，

号召民众行动起来抗议军阀的反动行为。

1925年1月15日，在全国民众与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直系军阀政府被迫将刘伯垂等释放。出狱后，刘伯垂奉国民党中央之命，组织汉口特别市党部。5月21日，成立临时汉口特别市党部。12月28日，汉口特别市党部宣告成立，管辖汉口、汉阳、武昌徐家棚等9区（后扩为11区）党务，设立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工人部、青年部、农民部、妇女部、商民部等机构。党员727人（大部分为中共党团员），4个区党部，30个区分部。<sup>[11]</sup> 办有《汉声》《励进》《商钟》《武汉工人》等刊物，《楚光日报》为省市党部报纸，董必武、刘伯垂先后负责。

由共产党人董必武、陈潭秋等主持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1925年7月成立）和刘伯垂等主持的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成为大革命时期湖北地区的坚强堡垒和国共合作的一面光辉旗帜。

首先，率领革命民众，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直系军阀的斗争。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省市党部立即成立临时指挥部，发起沪案后援会，号召江城人民行动起来造成声势，积极声援上海人民的爱国斗争。6月11日，英帝国主义与萧耀南军阀政府勾结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六·一一汉案”，英国海陆军士兵在汉口江汉路口疯狂扫射，死40余人。临时省市党部发出通电指出，汉案与沪案同一原因和性质，其“残暴野蛮之凶手，又均为英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祸首，是中国社会的乱源，因此“中华民族要解放，中国国家要独立，其第一步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sup>[12]</sup> 对萧耀南军阀政府，指出它甘心辱国媚外，“一面以流氓暴动诬蔑被惨杀之同胞，一面以高压手段压迫群众

爱国运动”，号召“各地同胞，于援助汉案之中，并祈申讨甘心为英、美帝国主义作走狗的直系军阀萧耀南”。<sup>[13]</sup>

10月，吴佩孚在汉口成立川黔桂粤湘浙闽苏赣鄂皖豫晋陕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以对抗广州革命政府。临时省市党部组织湖北各团体联合会等组织，作为反对军阀统治的公开机构，发宣言，申讨吴佩孚政权是使湖北民众“陷于万劫不复之境”的反对势力，号召广大民众行动起来，掀起“反对吴佩孚把持湖北政权”“收回全省政权的斗争”。<sup>[14]</sup>同时，具体开展反对军需对券、反对盐斤加价、反对湘鄂战争、反对契税改现、反对吴佩孚等运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媚外军阀”等口号响彻武汉三镇。<sup>[15]</sup>

其次，坚持第一次国共合作，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一开始就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反对。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聚集北京西山举行分裂会议，成立了西山会议派。其中，鄂籍右派人物居正、石瑛、张知本等在湖北也进行活动，遭到董必武、刘伯垂领导的临时省市党部痛击，使国民党右派无法在湖北立足。临时省市党部发通告声讨右派的罪行，指出他们参加革命的动机“莫不自私自利，以革命为发财的捷径，借本党为猎官的工具”。他们制造“国民政府赤化”“共产党把持本党”舆论，“排斥诬毁之劣卑手段以削弱党的革命实力，以维持自己结党营私之地位”，“尚望本部全体党员及全省革命民众一致奋斗，扑杀此獠：反革命的叛党党徒。”<sup>[16]</sup>

第三，组织民众迎接北伐军，参加武汉国民政府活动。



鄂州市刘伯垂纪念馆

1926年，刘伯垂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汉口特别市党部党务报告。在第二届一中全会上被委任为中央秘书处书记，“中山舰事件”后辞职返回江城。

7月，广州国民政府举行北伐战争，12日解放长沙。临时省市党部组织湖北特种委员会，迎接北伐军入湖北。8月31日，北伐军直抵武昌城下。驻守武昌城的主力系直系军队，武昌城墙坚固，北伐军缺乏重武器，久攻不下。董必武、刘伯垂动员老国民党员梁钟汉（瑞堂）担任武昌攻城别动队总指挥，发动武昌城四周工厂的工人与民众组成别动队，协助攻城。刘伯垂与梁钟汉策反武昌守军湖北暂编第一师宋大沛部，10月10日在攻城别动队的配合下举行起义。北伐军全线出击，胜利攻克武昌。

北伐军控制湖北，标志着国民革命的中心由南粤北移到长江流域。1927年元旦，具有执行国民党党政最高权职的武汉临时会议成立，决定国民政府设置武汉，史称武汉国民政府。汉口、武昌和汉阳为京兆区定名“武汉”，为临时国都。

刘伯垂投入新政权的建设，历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汉口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省政府司法厅厅长、逆产

清理委员会委员、湖北人民审判委员会委员等职。2月，参加对直系武汉防御总司令陈嘉谟、武昌守备军总司令刘玉春的审判。3月，参加制定《湖北惩治贪官污吏条例》《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并通过司法厅坚定执行条例，沉重打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用法律手段保护工农的正当权益。

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发出《通缉共产党首令》，通缉陈独秀、毛泽东、董必武等197名共产党领导人，刘伯垂位列第26名。7月15日，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撤销刘伯垂湖北省政府委员和湖北省民政厅厅长职务。刘伯垂毅然登报辞去以上职务，转入地下坚持斗争，年底流亡日本。

1928年，刘伯垂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担任机要秘书，后来与党脱离联系。

刘伯垂身处于时局诡谲、革命异常艰难的复杂环境中，以致他与党何时脱离联系、为什么脱离联系，至今还是一个谜。他留下的最后足迹，是在1933年1月福建事变中出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委员。福建事变失败后，到上海避难。1936年患肝病逝世，终年50岁，埋葬于故乡鄂州段店镇。

2004年，鄂州市在段店镇刘弄村建立刘伯垂纪念馆。2014年，刘伯垂墓列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 注释：

[1] 《发刊旨趣书》，《惟民周刊》第1卷第1号，1919年8月10日。

[2] 显静：《社会主义之分析论》，《惟民周刊》第1卷第8号，1919年9月28日。

[3] 显静：《社会主义之分析论》，《惟民周刊》第1卷第8号，1919年9月28日。

[4] 高振霄：《社会主义与我》，《惟民周刊》第1卷第5号，1919年9月7日。

[5] 见《惟民周刊》第1卷第2号，1919年8月17日。

[6] 见《惟民周刊》第1卷第1号，1919年8月10日。

[7] 见《惟民周刊》第1卷第4号，1919年8月31日。

[8] 《社会主义青年小组的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青运史研究室《青运史资料与研究》，1983年第2集。

[9]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49年，第31页。

[10] 独秀：《汉口之党狱》，《向导周报》第66期，1924年5月21日。

[11]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汉口特别市党部党务报告》，《武汉民国初期史料》“政党工团”，武汉出版社，2012年。

[12] 任宣：《反帝国主义运动之意义》，《武汉评论》第22期，1925年8月29日。

[13] 中国国民党临时湖北省党部电文，《热血日报》1925年6月21日。

[14] 《鄂民党对省政之主张》，《民国日报》1926年2月24日。

[15]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汉口特别市党务报告》，《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省区党务报告》。

[16] 《湖北省党部声讨叛党并告全体党员及湖北民众》，台北国民党党史馆档案（汉12559）。

刘旺琳，武汉十一初级中学教师；田子渝，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辛亥志士夏道南

◇ 张艳平

关于辛亥志士夏道南的研究比较少，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 20 世纪 20 年代首义公园的建设等相关方面。

2023 年，为传承辛亥革命精神，深化口述史学与辛亥革命研究，辛亥革命博物院启动了“辛亥后裔口述史访谈”项目。笔者有幸访谈了夏道南的重孙夏威先生。访谈的过程中，夏威提出目前广泛流传的夏道南的去世年份是错误的，希望能够得到纠正。为此，笔者查找了诸多史料，对夏道南的卒年进行了进一步考证，也使他的事迹较全面浮出水面。弄清楚他去世的准确年份，反映出文博人科学严谨的态度和专业精神，更是对辛亥志士的最好纪念。

### 晚清秀才投身辛亥革命

夏道南，字熏阶，1883 年出生在湖北嘉鱼簪洲镇。年幼时喜欢读书，1899 年 16 岁时考中秀才，1900 年考入武昌两湖书院。后来结识了陈天华、刘成禺等人，受进步思想的影响，醉心革命。庚子事变，在武昌投入新军，开展秘密活动。1903 年 6 月，在军中散布《警世钟》《猛回头》等书，事泄，离开新军，逃亡在外。

1905 年，夏道南回到湖北，考入武昌师范学堂。后被张之洞选派出洋赴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与陈天华、宋教仁、鲁鱼



1911年11月，黄兴（二排中）、李书城、夏道南（三排左二）等战时司令部成员合影

等人创办《民报》。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歧视并限制中国留学生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遭到留日学生的大规模抵制。12月8日，陈天华为唤醒同胞、抗议《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蹈海自杀。夏道南与胡瑛、孙武、张继、宋教仁等出面抗议，组织多所学校8000多名留学生联合实行总罢课。中国留学生随之集体回国，不少留学生学校关闭。加之东西方各报抨击，日本文部省眼见无法对抗舆论，遂将该规则中止。

1906年春，夏道南由驻日公使杨枢送入东京振武陆军学堂学习。1909年毕业即将进入步兵专科学校时，国内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夏道南因反对湖北铁路借款一事，与张伯烈一起被推举为回鄂争路代表。在湖北各界的积极支持和同情下，经过激烈斗争，湖北铁路最终被批准商办。1910年9月赴日本返校，进入参谋本部研究军事，同时学习测量。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夏道南潜返回国，在刘公的引荐下担任湖北军政府顾问，后又被军务部长孙武委任为军务部参议长。汉阳失守，黄兴主张放弃武昌、夺取南京，夏道南坚决反对，表示“身可碎，头可断，城不可弃”，并鼎力部署，固守武昌。停战议和后，夏道南任鄂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

1913年，夏道南退出军政界，在汉口组织东亚大同社，开办汉口大舞台。1919年春，在嘉鱼县狗尾山、虎山开办同益公司采煤，同时在汉阳琴断口创办和兴砖瓦厂。1923年，倡议修建武昌首义

公园，担任经理。1926年，为繁荣家乡经济，在簪洲镇开办鸿成电灯公司及机器碾米厂、压面厂。

1928年，为纪念辛亥革命17周年，湖北首义同人集资在武昌蛇山修建“总理孙中山先生纪念碑”，夏道南作为监造者，勒名于纪念碑正面左下方。

夏道南早年积极为宣传革命奔走呼号，1913年从北京回到武汉后，退出军政界兴办实业，以巨大精力和财力投入首义公园建设，为首义伤残军人谋福利，所开办的鸿成电灯公司为居民提供廉价用电，造福一方百姓。

### “1930年逝世”说从何而来

“夏道南逝世于1930年”的说法从何时开始广泛传播，暂不得而知。目前所看到的资料显示，涉及夏道南事迹的书刊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所述事功的时间相对较短，未及20世纪30年代；二是反映一生经历，但去世时间几乎都写为“1930年”。

《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依据湖北革命实录馆保存资料编著<sup>[1]</sup>中，其中卷有两篇“夏道南事略”，一篇为夏道南自己所作，一篇为冉剑虹所作。夏道南自述，仅记录个人在武昌起义前的革命活动及起义爆发后参与阳夏战争的情况。冉剑虹（1878—1963）在武昌起义后担任湖北军政府军务部秘书，南北议和后退出政界，致力于医学研究。冉文关于夏道南的事功也只记录到1913年夏道南组织东亚大同社、开办汉口大舞台，并未提及他此后经历及去世时间。

贺觉非编著的《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下册）<sup>[2]</sup>中有“夏道南传”，与《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夏道南事略”类似，其个人经历也以“创建武昌首义公园，自任经理”为止。

夏道南是嘉鱼县簰洲镇的历史名人，在嘉鱼或簰洲的地方志类书籍中频繁出现。1988年所编《簰洲镇志》中，夏道南的生平事迹记载比较详细，全文以“民国十九年（1930）夏道南因病逝世，在琴断口修砖墓以葬”<sup>[3]</sup>结束，是记录夏道南“1930年逝世”的较早书籍。1990年9月出版的《簰洲区乡土志》<sup>[4]</sup>、1992年10月出版的《嘉鱼文史资料第6辑》中，《辛亥风云嘉鱼志士录》<sup>[5]</sup>一文均认为夏道南1930年辞世。

除嘉鱼、簰洲地方志外，1990年出版的《湖北省志·人物志》（上），将夏道南纳入军事人物行列，生卒年也标注为“1883—1930”<sup>[6]</sup>。章开沅先生主编的《辛亥革命辞典》是近代史研究领域较为权威的专史辞典类工具书，1991年初版本和2011年修订本中，夏道南逝世时间均采纳了“1930年”的说法。

笔者由此推测，以嘉鱼、簰洲方志类书籍上夏道南的辞世时间为依据，导致后来

众多辛亥革命史研究、辛亥革命文物研究等相关书籍和论文，大多沿用“1930年”这一说法。

### 夏道南去世的准确年份

如果“1930年逝世”的说法有误，那么夏道南到底何时辞世的呢？

1934年，湖北教育厅编审委员会《民国二十二年湖北教育概况统计》第四编为“教育行政人员”，在“汉口市公私立各校馆园主管人员一览表”初级小学校表中，私立佩璋初级小学校主管人登记为“夏道南”<sup>[7]</sup>。该书在“凡例”第二条中明确“本书所列各项数量，均系根据二十一年下期及二十二年上期所属各机关之报告”。也就是说，至少1933年上半年，夏道南还在担任汉口市私立佩璋初级小学校的校长，尚且在世。据夏道南后人回忆，夏道南生前曾创办过学校，“夏道南担任私立佩璋初级小学校主管人”的史料，正好印证了夏道南后人的说法。

《武汉园林史料》<sup>[8]</sup>（内部资料）记载，夏道南1934年就首义公园建设事宜向湖北省政府呈送过报告。



武汉石门峰陵园夏道南墓碑

201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武汉市社科联编纂《百年回望——辛亥革命志士后裔忆先辈》一书，其中《夏道南与辛亥首义遗迹轶事》记载“先祖1936年在汉口去世，辞世前嘱后人将其安葬在汉阳琴断口砖瓦厂的堤内”<sup>[9]</sup>，并说明墓碑碑文由首义元老张难先题写。由于坟墓多次迁移，墓碑不知去向。

2013年，嘉鱼县政协主编《嘉鱼名人》，“1933年夏道南具文呈请省政府接收首义公园，直到1936年8月，才经省主席张群批复，由武昌市政处主任李捷才办理接收。这一年，夏道南在汉阳因病辞世，葬于琴断口，终年54岁。”<sup>[10]</sup>关于夏道南的逝世时间，《嘉鱼名人》很可能采信了2011年《百年回望》中夏道南后人的说法。

夏道南重孙夏威明确表示，夏道南肯定不是1930年去世的，“我父亲（夏道南之孙）是1931年出生的，有一次，我爷爷（夏道南之子）与夏道南的北京籍夫人发生冲突，夏道南执剑要砍我爷爷，我父亲抱着夏道南的大腿不让砍。如果能抱着夏道南大腿，那至少有四五岁了。”夏威表示，先祖夏道南的去世时间为“1936年”。

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武汉石门峰陵园专门修建了辛亥革命纪念园，夏道南墓由汉阳千子星空公墓迁移到石门峰，陵园内的夏道南墓碑上铭刻着生卒年“一八八三至一九三六”。

在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中，搞清楚一个历史人物准确的生卒时间，体现出后人对历史的尊重。虽然夏道南留存下来的文献、文物资料较少，关于他的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少，但其奋力缔造共和、竭力倡导辛亥纪念和戮力传承首义精神的历史功绩，应该得到进一步宣传和弘扬。

## 参考文献

[1] 湖北省政协、武汉市政协、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著：《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

[2] 贺觉非编著：《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

[3] 《簪洲镇志》编纂办公室编：《簪洲镇志》，1988年。

[4] 嘉鱼县簪洲区乡土志编纂领导小组编：《簪洲区乡土志》，1990年。

[5] 嘉鱼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嘉鱼文史资料第6辑》，1992年。

[6]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湖北省志·人物》（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

[7] 湖北省教育厅编审委员会主编：《民国二十二年湖北教育概况统计》，第95页，1934年。

[8] 武汉市武昌区园林科编：《武汉园林史料·首义公园资料汇编（1921-1949）》，1983年。

[9] 陈元生主编：《百年回望——辛亥革命志士后裔忆先辈》，武汉出版社，2011年。

[10] 嘉鱼县政协编：《嘉鱼名人》，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12月，第78页。

张艳平，辛亥革命博物院办公室副主任、馆员

## 武汉航空轨迹追寻（一）

◇ 刘宝森

### 中国第一支空中部队——鄂军气球队

甲午战争失败后，人们开始检讨中国军队屡战屡败的原因，并以筹饷练兵为急务。张之洞虽是文人，但甲午战败使他愈加重视军事改革和建设，对甲午战败作出深刻的反思：“中国自剿平发、捻以来，军威颇振。何以此次军务竟不支。查发、捻虽甚强悍，然究系流寇，与敌国不同。日本用兵效西法。简练有素，饷厚械精，攻取皆有成算，弁兵皆有地图，以及登山涉水之具，糗粮御寒之物，无不周备，而不惜重利，广购间谍。故今日之敌，迥非发、捻可比。”

基于此，张之洞在组建、操练新军的同时，促成鄂军组建了中国第一支空中部队气球队。

1783年6月5日，法国蒙特哥菲尔兄弟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个热气球，揭开航空史发展的新篇章。这年10月，他们进行首次载人飞行试验。12月，法国查尔斯和罗伯特研制成功氢气球并进行载人飞行两个小时的表演。1794年，法国首次将气球用

于军事。此后，在法奥战争、美国南北战争中，均使用气球担任军事侦察任务。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用战舰大炮轰开中国闭锁的国门，西方近代航空知识、器械相继传入。1855年，上海墨海书店刻版印刷英国医生合信（Benjamin Hobson）著的《博物新编》，其中配有轻气球图和巨伞图。书中介绍说，西方国家气球原来也中国的孔明灯一样，利用热空气上升原理，经过改进在气球内充入氢气，已从热空气气球发展为氢气球。

1884年5月8日创刊、清末著名画家吴友如主编的上海《点石斋画报》，发表“新样气球”“气球妙用”“演放气球”“气球破敌”等图。吴友如本人也绘有“履险如夷”图，描绘的是气球升空、抢险、破敌等场面。

1885年中法战争中，法国侵略军在战场上施放气球。《关外随营笔记》一文载“……法军踞土山，轰开花炮，并放气球空中。各村教民远升气球为号，四路麇集，形同越南并叛”。

1887年，天津武备学堂买来一只法军用过的气球，以供飞行表演、学员实习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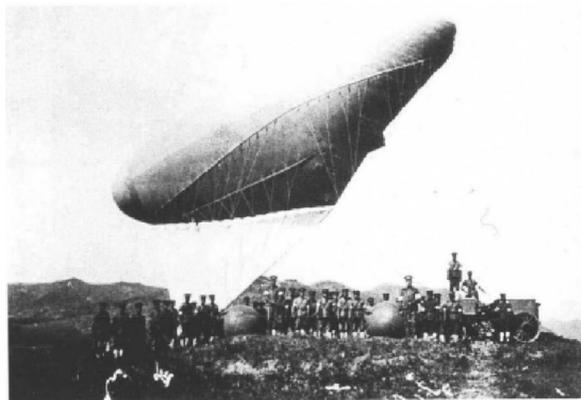
在上海江南制造局工作过的工程师兼数学家毕衡芳，在天津武备学堂当数学教习时，“德国教习购得法越交战时所用行军瞭望已敝轻气球一具。欲令学生演习试放，而教习居奇，久之而功不就。……乃督工别制径五尺小球，用强水发轻气以实其中，演放飞升，观者赞叹，教习内惭，工遂速竣”。这一直径为五尺的小球，是中国人自制的第一个氢气球。

1904年日俄战争中，沙皇俄国与日本军队在中国的领土上打仗，都使用过气球。

1905年，张之洞从日本购进山田式侦察气球两个，一红一白，在武昌阅马场东厂兵营操场检阅新军、新械时演放此球，召集学生列队观看。该气球为椭圆形，直径丈余，长有数丈，下系巨缆，固定在大绞盘上由10余士兵摇轴旋转升降。在数里高空，所看球体仍然庞大。气球下悬吊篮，人在吊篮中被气球带上天空以后，利用吊篮中装备的有线电话与地面联系，也可以使用旗语，起指挥、侦察及传递军事信息的作用。这次气球表演，为鄂军成立气球队奠定了思想、组织和物质基础准备。

张之洞调京任体仁阁大学士奉旨管理学部后，在他的关心和促成下，1908年2月湖北陆军第8镇气球队成立，为工兵八营右队，营长王永泉兼队长，并聘有日籍教练，配备山田式气球1具，这是中国最早的军事航空组织。气球体积庞大，以致工兵八营大操场上容纳不下，便放在武普通（地名，后为武昌体育场）。到5、6月，江苏陆军第9镇气球队、直隶陆军第4镇气球队相继成立，分别由工兵营营长邓质仪、高凝辰兼任队长，各有山田式气球1具。

10月，清军在安徽举行的太湖秋操即军事演习，湖北第8镇、江苏第9镇气球队



1908年，清军气球队参加太湖秋操

参加。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使用航空器。《中国航空史》作者姜长英在岳父龚齐坊家中，得到龚齐坊在清朝贵胄学堂学习时写的一篇《太湖观操记》，记述他参加这次秋操、看到放飞载人氢气球一事：“十月二十一日，上午九点出门，到猫儿岭看气球起落。内有官长以千里镜看敌方向。”

姜长英又得到日本三张由此事所绘的明信片 and 一张现场所拍的照片，一直将它们作为航空史的珍贵文物，后送至北京图书馆永久保存，留给世人参考。从照片上看，这次秋操正值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去世，兵士每人双臂上各戴白布箍，是为戴孝。

1909年，清政府军咨处、海军处、陆军部颁布《陆军气球预备法》，就向国外买气球、培养气球人才及各省新军组织气球队等作出若干规定。气球队的成立，开始纳入政府视野并有章可循。同年，陆军部编印《气球学》一书，为气球队提供统一教材。

1910年2月，清政府派人员出国考察军事。考察团成员徐元甫、田凯亭在日本乘坐气球升空飘行，成为最早乘坐自由气球飞行的中国人。是年，南京南洋劝业会展期，有人见过升在空中的气球。

1911年10月，军咨处在永平举行大规模秋操时，北洋军队需借用湖北陆军第8镇

的气球。是年5月，则由气球队队长王永泉送往永平并参加观操。武昌起义时，王永泉未回鄂，此气球遂留在北方。

### 孙中山、黎元洪运用飞艇保卫首义成果

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在致旅美同志的信中写道：“阮伦兄等谋设飞船队，极合现时之用，务期协力助成，以为国家出力，幸甚。”旅美华侨对国内革命形势非常关注，纷纷捐款在美国购买寇蒂斯飞艇6架，委托李绮庵、余夔等23人分两批运抵南京，援助国内革命。

武昌起义时的学生军袁学斌在《参加学生军 占守官钱局》一文中回忆：“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中旬，正当清军全力向汉口、汉阳反扑，双方激战之际，孙中山先生从福建送来一架飞机。飞机分装几个大木箱由火车运来，转放演武厅（武昌南湖飞机场），由我们几个学生军担任守卫，与飞机同来的还有两名驾驶员，其中一位是陈代表（名字忘记），首义前曾到法国学习飞机驾驶，所以这架飞机由他负责组装。但多次试车，由于引擎有故障，飞机未能飞行，因而也就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文中所言飞机即飞艇。

飞艇胖乎乎的像北极熊，有着笑容可掬的憨态，比飞机问世的早。世界第一艘载人飞艇诞生于1852年9月24日，法国吉法尔驾驶飞艇从巴黎起飞，以每小时8公里的速度飞行28公里，这一成绩远胜过莱特飞机的首飞距离。

1910年初，旅美华侨余焜和在美国自筹资金研制飞艇试飞成功。这艘中国人制造的第一艘飞艇，长约4米，宽约1.7米，上悬气球1只。气球用绸布制造，内充氢气，外涂黑漆。

武昌起义后，阳夏保卫战历时40多天，虽然革命军遭到严重挫败伤亡惨重，但在全国产生重大政治影响。为保卫首义之区，牵制清军，经黎元洪的及时吁请，湖南、上海、江苏、广西等省积极派兵相援。在这样的形势下，购买飞艇及枪支弹药乃当务之急。

1911年12月11日，黎元洪就运送飞艇等事项，致电江宁（现南京）都督林述庆：

“飞艇等项，嘱运武昌县所属葛店地方卸存。”16日，由“飞鹰”号军舰运来飞艇一架、开花弹一千、导火索一千、炮台州格梳林油15箱，至武昌县葛店。葛店兵站黄宗顺和“楚泰”号舰长马坝钰立即给黎元洪发电，请示转载事宜。黎元洪当即回电：“……仰即转飭派来之梅占魁护运至阳逻过载。刻已飭青山小火轮往阳逻接运。导火索直接交江西冯统领查收可也。”次日，黎元洪电复南京鄂代表：“宥电悉。万武定所解飞艇已到鄂。”

万武定，乃万声扬，又名午亭，1902年留学日本东京宏文书院。1905年加入同盟会，参与主编《湖北学生界》杂志。武昌起义后，任湖北军政府顾问、政事部文书局副局长、编制部副部长、战时总司令部秘书等职。由他押运飞艇抵鄂，是湖北军政府信得过的人物。

蛰居3年的袁世凯出山后，利用革命



德国齐伯林飞艇公司生产的“天舟600”充氦客运飞艇

党要挟清廷，又用清廷胁迫革命党，构成南北和谈的局面。飞艇抵鄂，为南北和谈、清廷退位增加了筹码。

1911年一份未具发电人姓名及发电日期给伍廷芳的电文中，提到“议和息战条件，彼此均应确守。近根据各处报告，民军在停战期内屡有违约的举动。……廿二（12月12日）据报，民军出动飞艇二艘赴鄂。”12月27日，唐绍仪向清廷宣称：“民军已改建共和为目的，若我不承认，即不允再行会议。默察东南各省民情，主张共和已成一往莫遏之势。近因新制飞艇二艘，又值孙文为沪，挈带巨资，并偕同泰西水陆军官数十人，声势愈大，并拟组织临时政府为巩固根本之计。”

飞艇抵鄂，鼓舞了辛亥北伐将士的士气。革命党人在各地民军支持下，挥师北伐。在《北伐队》和《欢送北伐歌》中，表现出人民群众参加北伐和支持北伐的热烈场面。《北伐队》歌的第二段歌词唱道：“快来快来，北伐军队预备再预备，汉族存亡争一旦，时机不可再。飞艇炸弹军器锐，胡儿惊破胆。直捣黄龙痛饮还，中华民国万万岁。”

在飞艇解至鄂的同时，湖北军政府成立了飞艇队，由刘佐成任队长，潘世忠作顾问。1912年1月14日，黎元洪向南京临时政府致电：“战期伊迩，所有空中战争物，亟宜准备。请飭山田式飞行艇多带硫酸亚铅铁屑及干燥药前来。刘佐成在沪军都督处所定制大炸弹四十颗、小炸弹二百颗及伍先生廷芳向日国所购之飞行艇二只，速解来鄂。此外尚祈购飞行艇用毡鞋、骆驼绒帽、毛手套各六十件，羊毛卫生衣一百二十套，最好钢线一分及半分各十斤，毛袜一百二十双。”

时隔一个多月，飞艇算是到鄂，但对交验一事与外商凌特发生矛盾，3月7日黎元洪就此分别发电上海胡子笏、伍廷芳，说明情况。“……飞艇抵鄂时，屡催凌特前来试验，而该西人竟潜身赴沪，迟迟至今，杳如黄鹤，贻误事机，殊非浅鲜。现在财政困难，岂能购此无用之物？请公与之严重交涉。该西人能任试验，无论如何困难，即将价银交清；如不任试验，则彼此退还。”

1913年1月7日，北京《正宗爱国报》载：“武昌建造飞行艇。武昌黎副总统近来颇注意军用飞行艇。前聘日本飞行名家山田猪三郎来鄂建造。支出七万五千元为建造军用飞艇之经费；并支出二万五千元建筑飞艇厂一所。闻已着手兴工，定于本年四月可告竣。又闻将组飞行队，教练一切，以为预备。”

1930年出版的《中国航空沿革纪略》（刘佐成著）载：“（1913年）八月，武昌都督府由宋教仁介绍，购回日本山田式气艇一具。请潘世忠负责装试。正在预备演放之时，忽起大风，将南湖气艇厂棚压倒，气囊破裂，失败。”

#### 参考文献：

- [1]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
- [2] 刘亚洲、姚峻主编：《中国航空史》，第2版，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
- [3] 钱平雷等：《未来的飞机，科学发现之旅》，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8年。

刘宝森，武汉公交集团退休干部

## 湖乡古镇大集场

◇ 周 敏

武汉市蔡甸区（原汉阳县）东北部的知音湖之滨，相传是春秋战国时期“伯牙子期相遇结知音”的故事发生地，这一地区因此被称为“知音故里”。我的家乡——大集场，就位于知音湖畔。

“大集场”这个名字，颇有些气势，宣示了此地曾经是一个很大的市集。其实，大集场面积并不算大，但有着自己独特的韵味，三百余年来见证岁月流转、世事变迁。

### 古镇

大集场形成于明末清初。初在今老街一带有几户人家，后逐现集镇雏形。明清年代，汉阳地区佛教兴盛，今大集场以南几百米的龚湾附近修建了“新收堡”（庙），香火日益旺盛，使得大集场逐步发展为一个热闹市集。

据《汉阳县志》记载：清末，县境内分凤栖、汉阴、丰乐、玉山、湘阴、山阳和怀泽7个乡。习惯上把汉水以北的新沟、柏泉一带（今东西湖区）称为北乡，汉水以南的大片土地称为南乡。乡以下共辖19里、208村（坊）。其中，南乡的玉山一里含南湖咀、张家渡、尉武山、鸭港桥等9个村，这些地方大都是今天大集街道的辖区，还有

些地盘旧属山阳二里和怀泽一里。抗战胜利后，汉阳县境内设25个乡、镇，1947年改为4镇19乡。其中，大集乡的治所就在大集场。建国后，汉阳县内建制、区划变化较频繁，大集场多为当地基层政府所在地。

地理上，今天的大集街道地处长江、汉江交汇处中间的滨湖丘陵地带，东与沌口街道、汉阳区永丰街道接壤，南与蓼山街道相连，西与玉贤街道隔湖相望，北与蔡甸街道毗邻，总面积73.2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积达17.2平方公里。从地形上看，大集总体上是一个三面临湖的大半岛。东北西三面，分别被南湖（现名知音湖）、皮四海、筲箕湖、高湖等包围，湖泊岸线曲折，长达80余公里，形成大大小小的港湾和沙洲。境内地势起伏不大，周边的乌龟山头、长山、尉武山等海拔多为百米左右，最高峰为西部的伏牛山，海拔也不过126米，农田以丘陵冈地冲田和临港汉湖田为主。

民国时期，大集场形成了东西向四条街、南北向三条街巷的规模，形状颇如鱼骨架。大集正街贯穿整个集镇，是大集场最主要的街道，这条八九百米的长街也是物资交易和服务中心。1958年私房社会主义改造前，正街东段从线子街口至大集餐馆处，道路中间建有房子，使之形成了平行的两条

街。接着向西至老街口，这一片俗称“大场”，是综合性的大市场，各种日用品和农副产品在此汇集交易。私房社会主义改造后，拆除了道路中间的房子，两街合二为一扩宽，让“大场”的范围得以拓展，大市场的功能更强了。

计划经济时代是新中国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大集场也是一个“五脏俱全”的小社会，正街则承担了大集场很大一部分的经济功能，聚集有各种各样的“单位”，每天都有上千人来“大场”赶集。集是露水集，天未亮人们便挑着蔬菜、瓜果、鱼虾、禽蛋乃至柴草、杂货从四面八方涌来，沿着街两边将担子摆开，等待交易。各式早点摊也摆开架势，烟火气袅袅升起。微明渐开，“大场”开始热闹起来。集场上的住户，提着菜篮子晃悠悠地来选购蔬菜。稍远一点来赶集的，则会购买柴米油盐日用品，再顺便过个早。周边的十里八湾，不时会开着队里的手扶拖拉机来集体赶集，一般是庄稼汉负责采办农资用品，姑娘婆婆则三两成群欢天喜地去逛街。上午九点钟散场，周边的道路上，轰隆隆的拖拉机满载收获驶回家园，洒下一路欢笑。

中国人重视年节，规模最大的集市会出现在春节前夕，各种售卖摊子从“大场”延伸摆到正街西北段的食物站，时间会延长至中午，真正叫摩肩接踵、川流不息。可以说，攘来熙往的“大场”，见证了正街的昔日荣光。直到如今，集场的人依然称正街这一段为“大场”。

### 老街巷

老街在正街背后的北面，走向与正街大体相同。名如其实，这条街是大集场的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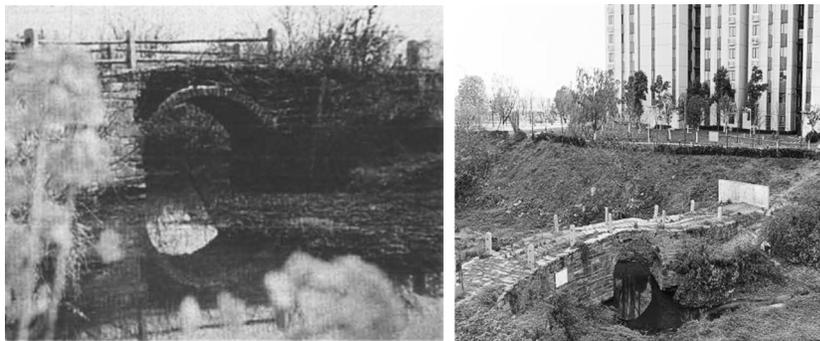
韧之地。听老人说，老街东头正对大集餐馆后门处，原有一座高大石碑坊，据说是为了纪念一位贞烈女子，姓甚名谁已不得而知。在我的记忆中，老街的几个出口都很逼仄，显得不是很敞亮。

线子街，南北走向，北接正街，南连棉纺厂，是大集场人气最旺的居民街。这条街曾以经营棉花棉纱（线子）土布为主，所以叫线子街。解放前，这条200多米长的街道两旁，集中了各式各样的铺面，是大集场的“繁华”所在。那时的大集场临街，几乎家家户户开门店，有米面铺、糖果铺、文具铺、胭脂铺、杂货铺、豆腐铺、裁缝铺、绸缎铺、纸马铺、布匹毛线铺等，还有油坊、酒坊、酱坊……生意兴隆，以线子街为盛。

我家就住在线子街上，1980年代标注门牌号码时为“线子街6号”。1930年代初，我曾祖父在汉口“汪玉霞”学徒，出师后在武昌保安街开了一家“周洪源”糕点铺。1938年武汉沦陷后，他回到大集场，在线子街上又挂起了“周洪源”招牌。

线子街的南端是棉纺厂，因为它的生产原料是棉花，集场的人都称之为“花厂”。大集场四周都是村湾，“花厂”就处在集镇与村湾交界地，几个主要车间紧挨着农田。南面一两百米是郑湾，再不远处又有龚湾，这里是我“太”的娘家（大集人喊奶奶为“太”，爷爷为“爹爹”，外公外婆为“家公爹爹”“家家”）。

小时候，每逢过年，我爸都会带上我，到龚湾给两个舅爹爹拜年。龚湾也是颇有历史的莲溪港的源头。莲溪港不长，约3000米，溪水自伯龙桥向东南蜿蜒而去，从西湾湖汇入后官湖。从前莲溪港自西向东，依次建有九如桥、三多桥、西板桥，均为明末清初建筑，算是这里的名胜景观了。听老人说，很



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三多桥

早以前，九如桥是一个商贾云集之地，春夏丰水季节，码头商船来往频繁，生意兴隆。这里临近新收堡（庙），应算是大集场的又一处肇兴之地。

1954年长江大洪水，大集场多处被淹，灾后进行水利改造，筑堤防水；莲溪港内又筑坝围堰，蓄水养鱼种藕，水系变化很大。莲溪港的三座老桥，只有取意“多子多福多寿”的三多桥得以保全，1998年被市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而古老的九如桥、西板桥早已不见踪迹。

龚湾以东百米处，还有一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熊伯龙墓。熊伯龙（1616—1669年），蔡甸蓼山人，顺治六年（1649年）榜眼，官至清朝内阁学士领礼部侍郎衔，康熙八年（1669年）歿于任所。卒后初葬于薛丰堡龙窝掌，乾隆年间迁葬于此。熊为清代知名学者和著名的无神论者，著有《无何集》及诗文传世。他长眠此处，让大集场多了几分人文气息。

丁字街是另一条东西走向的街道，也是一条比较敞亮的居民街。它的东头连着线子街的中部，两街形成“十”字型，西头则一直延伸到抬眼可见的农田处。丁字街上规模较大的店铺是李森记糖果作坊，生产麻花糖果饼干点心等。我“家公爹爹”一家原先就租住在丁字街上，经营一家文具铺，1950

年代才搬到线子街，和我家斜对门。

米场街在线子街以西几十米处，与线子街平行，北接正街，南连丁字街，形成一个“工”字型。这条街的地势很奇特，南北两个街口处高、中间一段低，一遇大雨便让居民苦不堪言。这条街的名字也来源于其功能。大集场的集市分“大场”“米场”，正街上的“大场”是综合性大市场，“米场”是专业性辅场，就在米场街南头的街口处，主营粮油米面及杂货、柴草，兼营家禽家畜。1960年代初正街扩宽后，“大场”的市场功能得到加强，加上供销社的日益兴起，“米场”便逐渐消亡了。

财神殿巷位于米场街西面，基本也是南北走向。它紧挨着冯湾，旁边就是池塘和农田。与别的老街巷相比，它较狭窄，也更静谧些。

如今大集场的钟陵路、车站街等，都不在这些7条老街巷的范围之内，它们是1980年代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但已夺了老街巷的风头。

## 绿豆包子

在大集场的早市上，有一种小吃鼎鼎有名——绿豆包子（也叫豆盘包子）。对大集人来说，这种圆扁形的素馅包子，是他们从小的甜蜜记忆。

据说，大集场的绿豆包子，可溯源于明末清初，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过去生活水平低，人们用相对便宜的绿豆馅代替肉馅来做包子，又为了方便储存，用油炸的方

法来延长保质期，成为了流传至今的美食。

大集绿豆包子与其他地方包子的最大不同是馅，它以绿豆为主料，洗净煮烂，起锅后再加入熟油和盐、味精、胡椒等调料拌匀而成。生姜的使用尤不能吝啬，它可以中和绿豆的寒性，并带给包子以独特的口味。

绿豆包子的制作颇有一番讲究。首先要选用新鲜的面粉，用温水揉和，加入发面粉装盆发酵。包制时，将发酵好的面团擀成直径为10厘米左右薄厚均匀的圆皮，左手托皮，右手拨入馅。掐包时，拇指往前走，拇指与食指同时将褶捻开，捏成皮薄馅实的包子。

包子放入蒸笼后，用旺火蒸不到半个小时即好。揭开盖子，会有一股绿豆的清香扑鼻而来。一口咬下，首先是淡淡的咸味，然后一股生姜的辛辣冲进唇齿，好特别的味道！

此时的绿豆包子还只能是算作半成品，真要吃了，是把凉透的白皮包子再放进油锅，炸至金黄色才算大功告成。外表金黄焦酥，里层白净松软，咬一口，清甜豆香顿时散发出来，软酥爽口，清热解火，而且价廉物美，是真正的绿色食品。

我小时候，大集绿豆包子卖三分钱一个，是大集场早点的主打产品，上学的孩子买个一二毛钱的，早餐就解决了。绿豆包子尤其受赶集的老人的欢迎，办完事后，叫上十来个刚出锅的包子，就上二两酒，满桌的金黄，满桌的酒香，摆个“龙门阵”，那份惬意啊……

绿豆包子还有一个大大的优点——方便。过去大集场乃至周围十里八湾，谁家要办个红白喜事，都是买上几百白皮包子，什么时候要吃了，丢进油锅炸一下，很快解决几十号人过早、宵夜的大问题。

绿豆包子的包装，也是有些讲究的。那时候没有什么食品袋，几十上百的包子，夏秋用新鲜荷叶包，冬春则用制作过的干荷叶包裹，荷叶的香气与包子的香气融为一体。

也许是吃多见多的缘故，很长一段时间，绿豆包子和其他早点一样，在集场人眼里并没什么特别，直到一篇文章的出现。那是1980年代初，《湖北广播电视报》发表一篇短文《大集的绿豆包子》，作者也许是第一次吃这种包子，顿时被它吸引住了，以至投笔报社表达美味享受。那时候的广播电视报是极受欢迎的小报，影响力很大，大集绿豆包子仿佛一夜名声大振，让本地人都高看一眼。

1980年代，大集场几乎每条街上都有人家做包子，且大都生意兴隆，以此发家致富。40年过去，如今的白皮包子卖到了7角钱一个，仍然受人喜爱畅销不衰，一些还做成了品牌。财神殿巷的冯氏绿豆包子是其中的佼佼者，常常供不应求，多次被新闻媒体推介。

作为一种地方名特风味食品，大集绿豆包子早已名扬武汉，少不了远道而来大集场，买上一二百个包子回城。每到春节前，更有人特地前来买包子，它已成为年货的一部分。

2015年，大集绿豆包子制作技艺入选武汉市第五批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这是我家乡的一大骄傲哩！

周敏，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干部